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6月30日第13期 总第15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59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十）

目录

【专稿】

宫香政 谁之过——北京大学文革前和文革中政治大分裂原因初探
附：谭厚兰 1967年11月15日的检查

【评论】

何蜀 从高云鹏“判刑”真相谈起

章铎 给俞小平的一封公开信

辛伯仁 答甘仲义——考证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件史实

【书评】

孙月才 真实的文革画面——读王复兴《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述往】

王复兴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红梅战斗队与红旗兵团

【文摘】

杨勋 北京大学的“四清”试点

【读者来信】

1. 皮皮侠建议《记忆》实行会员制
2. 七月流火提议出“北京高校文革专辑”
3. 魏平谈宋翔雁的回忆录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



官香政，1943年生于山东蓬莱。1963年从蓬莱一中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六年制）。文革期间曾担任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委员。毕业后，在廊坊锻压机床厂工作，1980年任分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1985年被打成“三种人”，并清除出党。1994年，作为第二研发人，参与开发的新产品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评为高级工程师。现居北京。

谁之过

——北京大学文革前和文革中政治大分裂原因初探

官香政

前言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五十周年。文革是一场浩劫，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本人是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受害者，今天回想起来思绪繁杂、感慨良多。

我为什么会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我是贫农的儿子，能考上北大、国家发给助学金，我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毛泽东。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思想。我深信不疑。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人对党、对毛泽东绝对没有怀疑。作为青年学生，我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决心“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尽管当时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想不通，但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

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这种时代语境下，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浩劫已经过去，历史会不会重演？文革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负面的历史财富，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和经验？在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时，这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

总结文革，回顾历史，应该跳出派性的圈子，客观真实地反应历史本来面貌。汉朝史官司马迁为了写好历史宁愿受宫刑，坚持真实记录当时所发生的史实，受到后人的赞誉。参加文革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能“为尊者讳”，不能“文过饰非”，更不能为了表现所谓自己“正确”而攻击别人去写假史。如果那样，就会泯灭了良知，误导了读者，欺骗了后人，就不能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

一、北大文革前的政治大分裂

北京大学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是各种政治势力角斗场。

1957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总书记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反右高潮。当时，主政北大的是江隆基。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共抓了526名右派，许多有才华的教授和学生被打入“另册”。即使这样，彭真仍认为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是“右倾”，被贬去兰州大学当校长。为加强党对北大的领导，派陆平来北大主政，进行反右补课。陆校长是北大的老校友，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来北大前是铁道部副部长。在陆平的领导下，北大又增划了173名右派，共划右派699人。¹这还仅仅指戴帽右派，另外还有一些人，像著名学者冯友兰等人被内定为“实质右派”（系党内控制不戴帽子），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人被定为“右派边缘人物”。

另外，在大跃进期间，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像科学院院士

¹ 1958年1月31日，北大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向校委会报告处理右派分子情况时讲道：到去年10月底共有右派分子526人（其中教职员90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右派分子173人（其中教职员20人），现共有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6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二版。

丁石孙（1984—1989年间任北大校长）被定为“白专典型”，两院院士王选（激光照排主要发明者、北大方正首任董事长）也被定为“白专典型”，当时在北大影响很大，很多教师和学生不敢搞科研和学问，怕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丁石孙回忆说：“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自反右以后，北大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担惊受怕，“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一扫过去那种百家争鸣、科学与民主、朝气蓬勃的学术气氛，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

马寅初1951年任北大校长。马老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57年提出了利国利民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建议。周总理赞同马老的意见，毛泽东先前说有可取之处，后来又变调了。他说，人多力量大，热气高，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但毛泽东不了解，人口的无序增长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马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遭到毛泽东的否定和批评。陆平说：“康生要我批马寅初，我说不能批，他仍坚持，我说你们实在要批，可以让人民大学批，北大不能批。康生说，我就是让你北大批。”在这种“圣意难违”的情势下，陆平组织北大师生对马校长进行了大批判。按照校领导的布置“不论哪个系都需上阵，贴大字报”，于是一夜之间大字报满燕园，甚至马老的住处燕南园63号家中的床头都贴了大字报。北大校刊上连篇累牍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批判会上还发生了低劣的人身攻击，所谓马老回杭州朋友聚会时“喝鸡汤不给鸡钱”。马老不屈服，坚持“一个人在战斗”。周总理曾劝他“写个检查就过去了”，马老说：我没错，不能写。就这样，马老被撤了校长职务，同时撤了全国人大常委。自此，陆平书记、校长一肩挑。“批了一个人，超生好几亿”。

1974年，毛泽东面对中国人口压力，不得不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计划生育的口号，进而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在机关、事业、学校、厂矿企业等单位采取超生者不涨工资，进而发展为超生者开除公职。在农村采取“节育上环”、“超生罚款”、“超生者做绝育手术”等硬性措施，来挽回这一重大失误。

1958年12月，奉上级指示，由北大、人大两校党委抽调150人共同组成“赴河南、

河北两省人民公社调查组”，指派邹鲁风带队，调查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运行情况。邹鲁风行政九级（有说七级），是一位搞经济学的老革命，1958年任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调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北大二把手）。调查组出发时，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和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主持了欢送会。

1959年5月调查组返京。回京后，调查组在编写调查报告之前向校党委做了汇报，校领导听取了汇报并参加了讨论，并再三嘱咐，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不要有顾虑。“调查报告”写出后，却惹出了大麻烦。

1959年庐山会议上揪出了“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北大和人大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被康生看到后，批为“反对三面红旗、猖狂攻击人民公社的大毒草”。面对这一“滔天大罪”怎么办？陆平组织了有关人员邹鲁风进行了批判，并认为邹检查不深刻。10月26日，陆校长找邹鲁风个别谈话。当晚，邹鲁风就自杀了。第二天，陆平同志在北大召开干部大会上宣布，邹鲁风“自绝于党”、“开除其党籍”、“邹鲁风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并声称“联合调查组是邹鲁风背着两校党委干的反党活动”。此后，150人调查组中的许多人受到批判、迫害。原北大哲学系常务副主任汪子嵩是调查组里的大组长，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右派”三顶帽子，发配门头沟劳动改造（后被平反，调人民日报社，任理论部副部长）。调查组中许多人被迫害，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党教导我们“要讲阶级友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在政治考验面前，陆平这种“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实在令人气愤与不齿。但我不认为陆校长是一位坏人，他这种“断尾保身”的做法实出于“无奈”。邹鲁风是“尾”，但陆校长不是“身”，这种卑劣的手段是怎样密谋与策划出来的？只有陆校长及其上司知道。陆校长已作古，留下的是一个“谜”。

在北大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被迫害的不仅是邹鲁风及其“人民公社调查组”成员，丁石孙也是被迫害的典型人物。他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时（即庐山会议公报），

在小组讨论会上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分子，我有些想不通，一个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向党反映社会上的问题是正常行为，不应该被看成反党行为，“何况他的一些意见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最后这句话被有些人揪住不放，被骂成“彭德怀的走狗、帮凶”。后来，校党委决定将丁石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校察看两年。其夫人迫于政治压力和为子女计，选择与其离婚。直到60年代初，中央为纠正反右倾扩大化，对丁石孙进行了甄别平反，其婚姻才得到恢复。

1962年，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来北大，召开干部大会为邹鲁风平反。他说，两校党委派邹鲁风带队搞人民公社调查，是奉北京市委和高教部指示而行。邹鲁风这一冤案的发生北京市委是有责任的。虽然冤案得到平反，但是它造成的恶果却不可挽回。那个密谋与策划的“谜”仍然没有解开。

陆校长在执行极左路线时，有时是相当卖力，并有过火的地方。例如，1960年全国处于挨饿状态，他想把南口的铁路直通北大昌平200号分校，派学生去修铁路，结果造成一些同学得了浮肿病。最后上级下令，才将学生撤回。再如，大跃进时正处困难时期，大炼钢铁，砸锅卖铁炼钢铁，砍伐森林炼钢铁；吃大食堂，到处在挨饿。北大的一些学生放假回乡或与家人通信，得知许多负面现象，会在学校议论，从而被打成反动学生。据说在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北大就开除了一百多名这类反动学生。哲学系心理专业56级安徽籍学生黄某某因言获罪，被开除回乡（大饥荒时安徽省饿死人较多）。他对被开除感到非常冤枉，在家乡不服管教，后来被枪毙了。四十多年后，才得到平反。

1964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在农村则叫“四清”。为了取得经验，北大是中央六个试点之一。遵照中央部署，派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来北大领导社教。后来，从各省市和部委抽调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高校党委书记或校长，组成250多人庞大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当时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是张磐石、刘仰峤、徐子荣、庞达和宋硕，排除了北大党委成员。在动员大会上，张磐石说：“为改进北大工作，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揭露

校党委的矛盾。”

张磐石的动员颇像 1957 年反右初期，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通过“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样。那些在陆校长主政期间被整的人和同情被整的人，以及对校党委有意见的干部教师，纷纷向工作组揭露校党委的问题。周培源副校长也起来揭露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在奚学瑶同学写的《陆平晚年谈周培源和聂元梓》中，陆校长回忆说：“社教中周培源是跟聂元梓一起造反的。周培源给周总理写信（告状）说我是‘三乱分子’……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市委副书记万里找周培源谈话，没谈出结果。万里让我主动找周培源，又没谈成……周培源根本不让我说话，一张嘴就给顶回来，气势汹汹，谈了五分钟，就谈不下去了……”可见，在北大社教期间，一些党员干部对陆平校党委的意见激烈到什么程度。

随着一些问题的揭露，以张磐石为首的工作组认为北大党委问题很严重，已经演变了，姓“资”不姓“无”了。¹此时，工作组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原上海市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认为张磐石搞“左”了。1965年3月17日，常给中央书记处邓小平等人写信，反映对工作队长张磐石的意见，并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张在北大的工作。3月20日，中办人员约常谈话并写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领导。3月30日，邓小平、彭真对常溪萍与中办人员谈话纪要做出批示，邓批评张磐石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²当时，彭真同志是中央书记处二把手，又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和北京市委认为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彭真就找了陆定一，让他撤换张磐石。毛泽东闻听后，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姓陆的整了姓陆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整了北大校长陆平）。

后来，中宣部改派另一位副部长许立群任北大社教工作组组长。许到任后，改组了社教领导小组，吸收了陆平、戈华、彭珮云进入领导小组，并将 250 多人的工作组集中在民族饭店召开会议，集中批判张磐石的左倾错误。会后，工作组解散，各回原单位。尔后，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 84 页。

² 同上，192 页。

北京市委派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宣部派副部长许立群来北大，组织北大党员干部进行社教运动整风，重点是哲学系和经济系。先前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因为给校党委提了意见而挨整，这与反右斗争“大鸣大放”之后秋后算账抓右派相似。彭真在人大大会堂向北大党员干部讲话，要求“把北大的大是大非解决好”，还说：“有人说，给社教积极分子整风是打击社教积极分子。但我们现在是‘兴无灭资’，资产阶级思想都要灭，为什么批不得？”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说，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刺刀见红”。

转眼间，北大社教“翻了烧饼”，积极分子被批判和做检查。在国际饭店安排住宿时，对重点人，如聂元梓，进行隔离、跟踪、监视。但是，国际饭店会议与反右又同中有异。一，被整的党员干部中有许多人是打日本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的老革命；二，他们给党委所提意见有根有据。在面对面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中，陆平一派经常处于被动状态。

他们认为，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在大跃进期间抓“白专”典型，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打错了那么多人、冤枉了那么多好人，可他们从来不整自己的风，而我们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提了一些意见，却要整我们的风。尽管当时政治压力很大，但是这些人不服输、不认错。国际饭店会议从1965年春夏之交到1966年初，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两派相持不下。不久，邓拓因“三家村”被批判，自顾不暇，北大社教整风运动草草收场。

返校后，陆平校党委借农村“四清”需要为名，将许多社教积极分子派往农村，使其边缘化。例如，技术物理系的戴新民等被派往大兴，哲学系的聂元梓等被派往去怀柔。陆平还通知各地工作队党委，不准让这些人担任工作队队长。一些社教积极分子厌烦了这种内斗，纷纷要求调离，如张恩慈、杨克明等。

此时的北大党委已经坐在火山口上，只要稍有一点地震，火山就会爆发。

北大的社教目的是什么？它运动了谁，教育了谁？事实上，它任何问题也没解决，反而造成了深刻分裂，为后来的更加激烈的政治斗争埋下了种子。正像原北大生物系副主任胡寿文所说：“1958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陆平同志领导北大工作，这段时间政治运动不断，挫伤了许多好同志。虽然他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北大他当然负有主要责任。”

原北大社会科学处处长夏自强认为：“1960年后，批判了哲学家冯定，这些批判在党内发生较深刻的消极影响。从此依稀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北大爆发的一些根源。”北大历史系62届毕业生王曾瑜在《北大五年》中说：他在北大的五年（1957—1962年）是“多灾多难”的时期，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¹

文革结束后，陆平得到平反。其女儿陆莹劝他写回忆录，把一些问题说清楚。陆平说：“我不能说这个人是谁（指党内高层）。”陆莹说：“父亲一直沉默了三十六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文革前后的陆平就像电饼铛中的饼，上下都在烙烤着他。他有话不能直说，有思想不能表达，真相不敢披露，他是多么无助。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我曾听闻，罗瑞卿大将平反后，罗问原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将军，在1965年上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1966年初军委扩大会议上，各位老师对打倒罗瑞卿是怎样表态的？雷英夫很为难，没有回答罗的问话。雷事后说，我若是告诉罗总长各位老师是怎样表态的，我就要两面挨打；我不告诉他，我是一面受敌。从陆平和雷英夫的话语中，可以听出两位老革命在党内斗争中的纠结与无奈。

北大人评论历届校长时，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蔡元培、马寅初和丁石孙。

蔡元培(1868—1940)是“同盟会”元老之一，辛亥革命胜利后担任教育总长（教育部长）。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他愤然辞职。1916年担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先后聘请了鲁迅、徐悲鸿、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李四光等人来校任教。在这里，孔孟之道、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新旧思想交融碰撞，他把北大变成了科学与民主的圣地。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北洋军阀逮捕了许多北大学生，蔡元培与北洋军阀交涉保释学生，并决然辞职。

马寅初（1882—1982），1957年向国务院提出了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后，全国各大报刊对他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批判。他不畏政治高压，于1960年1月4日发表了“新人口论”。北大随之掀起围攻批判此论的高潮，他坦然处之，说：“老夫年过八十，明知

¹ 详见《北京大学新闻网》。

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丁石孙（1927— ），大跃进时被插过“白旗”；1959年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帽子，开除留用两年；文革中是被整的对象，迟群、谢静宜当政时被扣上“反对教育革命的帽子”。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机智地保护了带领学生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青年教师。文革后，在清理“三种人”时，他又保护了青年学生。他曾对有关调查人员说：青年学生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些过激行为可以原谅，过去他整我，今天我整你，这样下去何时完了？1984年，北大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民选校长，他众望所归高票当选。在他执掌北大期间，领导并组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建立了光华管理学院；领导和支持王选院士建立了方正集团；领导建立了环境学院。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他劝告学生们可以在校内游行，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他控制不了学生们的行动。不久他受邀出国访问，在美国的私人宴会上，他对国内的学潮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国内的学潮是“五四运动”反封建的继续。结果丁校长回国时，在首都机场被宣布撤掉北大校长职务。后来，在外力和内力的合力作用下，才得以复出。

北大人为什么钦佩这三位老校长？因为他们在时代激流中，都代表追求时代真理的精神，表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怀有海纳百川的胸襟，都有一套科学治校的方略。这也正是北大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二、文革中北大的分裂

北大在文革中的分裂，主要来自于中央上层。兹概述如下——

（一）中央领导意见相左，造成北大“左派”分裂¹

毛泽东从1966年5月出现的大字报中，选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²，做出了“由新

¹ 这里的所谓“左派”，指的是文革中对北大社教运动积极分子的称谓。

² 1966年5月，在“五一六”通知后，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吴传启等人于5月23日贴出的“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高教部的卢正义和徐非光于5月26日贴出的大字报；人民大学的肖前也在此前后贴出

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指示。大字报经中央台广播后，震惊了全国。北大的形势逆转，成了“黑帮”的陆平等陷入灭顶之灾，聂元梓等人成了闻名一时的英雄人物。

1966年9月11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主持和指导下，采取所谓“巴黎公社”选举法，产生了以聂元梓为主任、孔繁等四位同志为副主任的校文革。由于哲学系“左派”较多，校文革名额有限，杨克明虽然进入了校文革，但未能进入常委。聂元梓安排杨克明担负重要任务，主持北大校刊和宣传工作。

在北大，树谁为领军人物？毛泽东与康生意见相左。王力在《反思录》中谈到：

十一中全会后正式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毛泽东叫王力兼，副主任有穆欣、曹轶欧。首先江青不要曹轶欧，直接原因是曹轶欧与聂元梓有矛盾。曹轶欧和康生不喜欢聂元梓，意见很大。认为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是杨克明写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聂元梓组织同事们写的，杨克明是主要起草者之一——笔者注），曹轶欧这时正在北大，知道这事。杨克明写好后叫聂元梓签名，聂元梓最初拒绝不敢签，经说服后才签的。因为她是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才签在第一名。把聂元梓抬的那么高，曹轶欧不同意。所以后来列席十一中全会时，北大是两个人，聂元梓和杨克明都列席。后来还是都捧聂元梓，没有杨克明。康生也不同意把聂元梓捧的那么高。

现在有人说是康生授意曹轶欧组织聂元梓写的大字报。这跟我了解的不一样。曹轶欧到北大不是文革小组派的，是康生的理论小组派的。冲突的结果是江青支持聂元梓。江青跟我说，不要曹轶欧当办公室主任，要我去讲，说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因为聂元梓同曹轶欧有矛盾，聂元梓旗子已树起来了，同聂元梓对立的人不适合在中央文革工作。江青还让我不要说是毛泽东说的，也不要说是江青的意见，要作为我自己的意见去说，她并说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叫这样说的。我只好去跟康生说：“请你考虑，曹大姐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文革小组办公室搞些事物性的事情，曹大姐不要做这些具体工作了，她当副主任，排

了大字报。

到我们下头，也不好看。以后她要什么材料我们马上给她，有什么事我们不清楚去向她请教就是了。”康生马上变了脸，说：“怎么回事，曹轶欧不能干了？”我说：“不必干了吧。”康生指桑骂槐，骂穆欣忘恩负义，往高杆上爬，只认识江青，不认识我康生了。过不几天，他知道是毛泽东、江青的意见，也就没事了。他说：“曹轶欧身体不好，不干了”。以后曹轶欧一直还是活跃的。

这里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张恩慈。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教师，因写了一篇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赞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论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北大社教前期，与聂元梓和杨克明都是积极分子，后被康生调入康办。他得知康生与曹轶欧不喜欢聂元梓，并且对聂的意见很大，想树杨克明为北大领军人物。但是，张恩慈并不知道毛泽东决意要树聂元梓。张恩慈就把康、曹要树杨克明的意图告知了孔繁与杨克明，从而在杨克明与聂元梓之间插上了楔子。

受康生“树杨贬聂”的影响，文革初期，张承先工作组进北大后，对孔繁和杨克明比较器重。陶铸同志来北大视察时还握着杨克明的手说：“你就是大字报的作者。”表示对杨克明的关注。这一切都增强了杨克明与聂元梓争功的底气，所以在聂元梓主持校文革工作中，杨克明和孔繁在许多问题上与聂元梓搞摩擦、搞内耗。例如，在批判陆平的方式上、在文革展览会布置上、在对待工作组的态度上、在对待王任重的态度上等经常掣肘，致使校文革无法正常工作。另外，聂元梓十七岁参加革命，去过延安，经历过延安整风。她对江青历史有所耳闻，深知康生整人不择手段，许多事情直接“通天”，关系复杂、政治风险大。所以，在一些问题上，聂元梓有自己的想法，又难以向大家表明心迹，怕引起麻烦，使人觉得她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聂元梓在文革初期被捧得很高，不免有些飘飘然，这些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在此情势下，孔繁、杨克明就向聂元梓发难，要求聂元梓退出校文革，交出手中权力。

中央文革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为保聂元梓这面旗，1967年1月3日江青在接见北大红

卫兵代表时指出：“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体现。”“孔繁是邓小平的人。”（孔来北大前在二野司令部担任机要员）这给孔繁、杨克明打了一闷棍。随后，在校内对孔繁、杨克明开展了批判。1967年2月10日校文革改组，孔繁、杨克明被清除出校文革，孙蓬一开始担任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孔繁与孙蓬一均曾借调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北大的左派队伍就这样开始分裂了。

（二）王、关、戚加剧了北大的分裂

1. 王、关、戚拉帮结派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中是仅次于陈伯达、康生、江青的主要成员。文革初期，他们为了抓住文革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利用原有的朋友和亲信在各部门拉帮结派，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利用他们在毛泽东身边的方便条件，随时将高层的政治动态和机密透露给其亲信，以便让他们的嫡系竖起政治斗争的风向标，抓住主动权，并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吴德同志在他的《十年风雨纪事》中有这样的叙述：“（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委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质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涂武生，所有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

关锋曾在学部工作过。关锋和吴传启、林聿时一起以笔名“撒仁兴”（寓意为三人行）发表过许多文章。解放前，吴传启是武汉的国大代表、国民党员。在孟祥才所写《文革三千将人生结局揭秘：多以凄凉收尾》中有这样的叙述：“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司局级干部。文革前与关锋是老朋友。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关锋那里得到核心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视当前的政治动向，凭借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

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干部打入‘走资派’行列。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

5月26日康生对学部运动做了“四点指示”，对其表示支持。在王、关、戚的运作下，他们的手不仅伸进了北京市革委会，而且他们还乘上海“一月风暴”之机，伸进了中央各部委。请看他们拉帮结派的关系网如下：

通过林杰控制《红旗》杂志；

通过吴传启控制《北京日报》；

通过刘郅控制统战部；

通过洪涛控制民委系统；

通过徐非光控制高教部；

通过成立“批陶铸联络站”控制文教口；

通过成立“批谭震林联络站”控制农口；

通过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络会”控制工交口；

通过周景芳和杨远控制北京市革委会；

通过谭厚兰（原在《红旗》杂志工作过）控制北京师范大学，等等。

1967年1月18日中央文革和周总理接见北京市红卫兵头头时，周总理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应该参加社会上的夺权斗争，要为夺权做出贡献。”根据周总理指示，北大派出部分师生和在校搞军训的解放军，一起去高教部夺权，结果遇上了谭厚兰带领师大井冈山的人也去夺权。两校相持不下，后来，北大师生与解放军主动撤离。这一事件引起关锋等人大怒，先后打电话给聂元梓施压，并造谣说：“北大军训部队和学生一起去高教部，冲击了谭厚兰那一派，解放军搂抱女学生，侮辱女学生，你聂元梓在学校里遥控指挥，你必须到高教部给谭厚兰道歉。”¹

由于王、关、戚的挑动，北京市高校在社会上形成了两大派，开始称“北大派”“师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200页。

大派”，1967年6月后改称“天派”和“地派”。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和以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为“地派”的两个主要院校。而“天派”中的北大、清华、北航并非牢固的盟友，在许多社会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

2. 北大校文革成了“保皇派”

“二月逆流”发生后，王、关、戚将消息透露给谭厚兰。北师大井冈山等嫡系组织得风气之先，贴出了“打倒谭震林”、“打倒李先念”、“打倒李富春”、“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打倒余秋里”的大标语。此举震动了全国，人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3月9日，林杰向其嫡系讲话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一个是周总理的司令部。现在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斗争。”洪涛说：“现在要揪出一个保人保的最多的人，这个人比李富春还大，但不是中央文革的，揪出来要吓你们一跳。”矛头所指已经明明白白。

面对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风潮，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认为，他们打倒这些人是要揪周总理这个后台。出于对周总理的敬仰，大家认为应该保总理，不能随波逐流。所以北大在反击“二月逆流”中跟得慢、表态迟、调子低，对这些人只提“炮轰”，没提“打倒”（后来只对谭震林上升为“打倒”）。因此，北大被王、关、戚支持的一派骂为“二月逆流派”、“北京市最大保皇派”。由于校文革在“反击二月逆流”中采取了“一批二保”的态度，也引起了少数师生的不满，这也是造成校内分裂的一个因素。

3. 牛辉林心怀异志

牛辉林与聂元梓反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牛辉林当时是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是一位热血青年，活动能力强，社会联系广泛。文革初，他紧跟聂元梓，经常造访聂元梓。他能与聂元梓、陈葆华等人一起去抄聂元梓前夫吴溉之的家，说明他与聂元梓关系不一般。牛辉林为什么后来成为反聂的旗手？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1）1966年底至1967年初，北大在社会上的一些活动与王、关、戚的政治势力发生过多冲突，经常受到王、关、戚无端的指责与批评，这使牛辉林对聂产生了怀疑。（2）反击“二月逆流”中北大很不积极，

牛怀疑以聂为首的校文革是一个保皇组织。(3)牛辉林与王、关、戚的得力干将洪涛拉上了关系，受他们的挑唆掀起了反聂的旗帜。

1970年，牛辉林在清查“五一六”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当时迟群、谢静宜主政北大，作为宽大对象的牛辉林发言，坦白自己有三条罪状。一是自己由洪涛介绍加入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曾将北大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他又把这份名单交给了军宣队，希望凡是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不要相信攻守同盟，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二是在洪涛的唆使下，在北大挑动武斗。三是说了一些关于江青同志的坏话。

(三) 陈伯达“六·五”讲话，北大彻底分裂

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对王、关、戚拉帮结派、挑动分裂、培养自己政治势力的做法不满，但王、关、戚当时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明争，只能暗斗。于是，他们采取了“猛攻吴传启，上不揪后台”的策略。这招很灵，吴传启历史复杂，不堪一击。作为吴之密友的王、关、戚很被动，中央文革也很难堪。王、关、戚不能亲自出面打压北大，只能推出陈伯达来打压北大。¹

于是，1967年6月5日晚至6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首都红代会头头时，批评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颗重磅炸弹把北大师生员工炸懵了。这是不可调和的路线问题，聂犯了滔天大罪。北大开始重新洗牌：原来反聂派认为自己反对了，中间派和游移派认清了形势，立刻站到反聂的立场上；保聂派则认为陈伯达“六·五”讲话是“无中生有”、“纯属诬捏”，聂是毛泽东树的典型，必须保。反聂派喊出了“聂元梓下台滚蛋”的口号，保聂派则采取了“一批二保”的做法。在北大乱成一锅粥时，陈伯达感到不妙，立刻通过他的秘书王文耀传话给北大说：伯达同志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爱护的，有人利用我的讲话，要打倒聂元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陈伯达这种假惺惺的做法于事无补。

¹ 在此期间，李讷从北戴河回来告诉聂元梓：“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聂元梓回忆录》，第251页。

在北大重新洗牌之际，最具影响力的是周培源副校长。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还是坚决与陆平“黑帮”斗争的老左派。社教期间和文革初期，周与聂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对聂赞许有加。文革中，他被派往汉中分校主持工作。1967年5月，周培源回到北大，正赶上陈伯达“六·五”讲话。他认为聂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划清界限，所以就站在反聂的一边。

1967年7月11日，学部派往北大的联络员李惠国传达林杰、林聿时、周景芳的指示，要求“反对派联合起来，否则的话，聂、孙会把你们吃掉”。王恩宇又做了四点指示：（1）你们要联合起来，不要争名称，要求同存异；（2）要让周培源当一把手，理由是小将容易被打成反革命，而周培源可以与“老佛爷”（聂元梓）对抗，使组织不易搞垮；（3）对聂元梓的问题要注意，不要无限上纲；（4）要准备长期斗争。于是，反聂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8月17日召开了联合大会，按照洪涛的指示不叫“八·一七”，取名为“新北大井冈山兵团”。1967年11月28日，井冈山兵团举行欢迎仪式接纳孔繁、杨克明参加井冈山兵团，并参加总部工作。季羨林老先生也从先前支聂站到了反聂阵营，戴上了红袖章，并且担任了东语系红卫兵的头头。校文革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少数同志脱离校文革，参加了井冈山兵团。

自此，在北大形成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支持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与以周培源、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两大政治派别严重对立的局面，彻底分裂。

1967年武汉“7.20”事件发生后，王力、关锋主持起草了“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毛泽东看到社论后，为之震怒，斥责为“毁我长城”。接着，8月7日王力又在外交部讲话，煽动部分群众冲击、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严重后果。王、关这些行径彻底激怒了毛泽东。1967年8月底，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与此同时，林杰也被逮捕关押，不久，又下令将戚本禹逮捕、监禁。北京市革委会也进行组织清理，周总理下令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人也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自此，王、关、戚彻底倒台，但是，他们造

成的北京市大分裂和北大的一大分裂却没有结束。

王、关、戚倒台，陈伯达压力很大。他怕聂元梓揭露他与王、关、戚沆瀣一气搞阴谋诡计的罪行，向聂元梓道歉说：“过去我对你说了一些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¹

王、关、戚倒台，对井冈山兵团打击很大，一些师生“下山”，重新加入新北大公社。其内部群众责问牛辉林为什么会上了王、关、戚的贼船？牛辉林辩解说“是他们主动找的我们”“我对他们不了解”，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王、关、戚倒台了，“井冈山兵团”为什么没有垮台？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1）陈伯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批聂元梓犯路线错误，井冈山反聂当然有理；（2）周培源是国家保护对象，具有影响力，周总理曾劝他退出井冈山兵团，他确实可以与聂元梓对抗；（3）井冈山兵团中与王、关、戚有牵连的人是少数；（4）井冈山兵团也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坚持批判刘、邓、陶，批判彭、罗、陆、杨，批判陆平黑帮的革命大方向；（5）最重要的是中央对聂元梓的态度有所变化。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表现令上峰不满，聂元梓、孙蓬一1967年4月10日状告王力、关锋，更是捅了马蜂窝。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二月逆流”问题。谭厚兰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功不可没。王、关倒台后，1967年9月7日在师大发生了揪斗谭厚兰的“九·七事件”，中央当天就表态保了谭厚兰，迅速之极。而发生在北大的“聂元梓下台滚蛋”却得到纵容。

三、中央决定拔掉北大这颗钉子

1967年春夏，王、关、戚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未果。1968年春天，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动手拔这颗钉子，为什么？

我认为有以下的理由。（1）纵观聂元梓在文革中的表现，她是紧跟毛泽东的，但只做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225页。

了三件让无产阶级司令部满意的事，即带头贴了一张大字报；受毛泽东指派去上海串联，支持上海造反派；从小道得知毛泽东说，现在写刘少奇大字报多，写邓小平的大字报少，尔后聂元梓又带头贴了邓小平的大字报。其他的事基本没有做，比如反吴传启，让中央文革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非常被动；反击“二月逆流”时，北大跟得不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心知肚明；康生让聂抓叛徒，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向上打了报告一个没抓着；江青拉她，聂没上套；在“揪刘火线”上，北大没有随波逐流；针对谢富治与王、关、戚勾结，聂元梓和孙蓬一两次炮打谢富治，使谢很被动恼火；江青、陈伯达让聂“反大个的”（指周总理），聂装聋作哑，不予理睬。江青批评说：“聂元梓骄傲啦，不听我们的话啦，叫她反右她反左。”“聂元梓的助手孙蓬一不好，孙蓬一出许多坏点子”等等。种种事实表明，聂元梓已经让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失所望，她不再是驯服的领头羊，而是一位有主见、不听使唤的异己力量。（2）拔掉北大这颗钉子，不仅仅是要搬倒聂元梓，而是要通过解决北大问题，刹住全国红卫兵运动的车，让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

要拔掉这颗钉子，必须大造舆论和组织解决双管齐下。

周景芳曾在地派中大肆诬蔑聂元梓是反毛的头子。在聂树人（地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叙述：1967年7月某日晚饭后，周景芳来到地院的李贵家，与张海涛、聂树人等人见面。周谈到聂元梓——

全国解放至今，我党曾出现过五个反对毛泽东的圈子：第一个圈子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第二个圈子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第三个圈子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第四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以上这些反党集团形成了反党的圈子，他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集结了相当的势力。但是，在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他们都失败了。

现在，又有一个反毛泽东的圈子正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个圈子就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有金字招牌的人。他们与刘邓司令部的人暗中勾结，听命于他们，到处伸手，网罗势力，

准备有朝一日与毛泽东摊牌。这个圈子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图穷匕首现的。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¹

周景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这只是他“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周景芳没有胆量和见地提出“五个反毛圈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上层有过这种议论，不过这种议论把聂元梓抬得太高了。周景芳虽然已倒台，但他这个“个人看法”在“地派”里流传甚广。他们把聂元梓看作潜在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68年3月，北京市革委会以整风为名大整聂元梓。聂元梓认为自己没错误，拒不检查。市革委会就将聂在市革委会整风的情况传达到街道居委会，以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

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干部紧急会议。林彪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反党集团，并对三人进行了组织处理。在会上，林彪还点了聂元梓的名，林彪说：“他（杨成武）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讲。”在这里，林彪暗示聂元梓与“杨、余、傅反党集团”有着某种黑关系。文化革命中，聂元梓与林彪八竿子打不着，林彪却当面造谣。当天晚上，北京城刷满了“打倒杨余傅”、“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的大标语。

在聂元梓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叙述：

北大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刘福，是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一天夜晚谢富治在卫戍区召集市有关领导人会议，刘福也参加了。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溜出来，（打电话）对他女儿刘新民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回学校。刘福是怕第二天学

¹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第225-226页。

校出事情，怕他女儿赶上，发生什么危险，……刘新民睡的迷迷糊糊，对她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¹

这说明，林彪在3.24大会堂讲话诬捏聂元梓与“杨、余、傅反党集团”有黑关系，是事先预谋好了的。

在组织围剿方面采出内外夹攻的方式。

因为江青说“聂元梓的助手孙蓬一不好，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所以井冈山在校内贴出“打倒孙蓬一”、“聂元梓下台滚蛋”、“一切权力归井冈山”的大标语，发通缉令“通缉孙蓬一”，围攻、殴打孙蓬一。井冈山少数同学不断挑起小规模武斗，打伤了新北大学公社负责人孙月才，公社的同学也打伤了井冈山的负责人侯汉清。井冈山兵团驱赶28楼公社的同学，占据了28楼。他们冲击校文革主持的会议会场，以武力夺走广播喇叭等，一时间北大校内火药味十足。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8年3月22日，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一千多人来北大游行，呼喊“打倒孙蓬一”、“揪出聂元梓”等口号。

3月23日，新人大公社等六个造反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3月24日，北京农业大学一些造反组织到北大示威，宣传“打倒聂元梓”。

3月25日，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他们气势汹汹，高呼“打倒孙蓬一”、“聂元梓滚出市革委会”口号，在北大校内游行示威，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256页。

尔后聚集在北大广播台，要砸北大广播台。一场校内外大规模流血武斗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急。此时聂元梓正在市革委会，闻讯后揪住谢富治不放，并上了谢富治的汽车。谢富治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跟聂元梓来北大，吴德、丁国钰也跟来了。谢富治进入北大广播台，向校外学生喊话，让他们撤离北大，终于防止了一场不可预计后果的大武斗发生。

“拔掉北大这颗钉子”的行动，被聂元梓揪住谢富治不放给破坏了，谢富治无可奈何的说：“聂元梓，你真厉害！”

几个院校万余人为什么能够步调一致来北大？谁是幕后组织者？事后聂元梓问王大宾，王大宾说不知道。最有说服力的是吴德在他的《十年风雨纪事》中说：“……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武斗的积极态度。”¹

事实表明，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就是要利用地派院校，通过内外夹攻，挑起武斗的方式拔掉北大这颗钉子，但未能实现。

“3.25”围剿北大未成功，江青又继续施压。3月27日江青在十万人大会上，又一次点名批判聂元梓“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3月28日晚，发生了北大井冈山的同学分别在40楼、30楼驱赶公社同学的事件。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认为28楼和31楼是学生宿舍中心区，28楼已被井冈山兵团占领了，31楼里井冈山人员较多，他们又有武斗准备，如果井冈山兵团占据了31楼，那么就占据了北大的战略要地。所以必须奋起反击，把井冈山的同学从31楼赶出去。

于是，发生了“3.28”武斗。在当晚武斗中，新北大公社的同学占领了31楼，井冈山兵团占领了40楼。俞小平对此有这样的陈述：“（3月28日当晚）不仅31楼，40楼也打起来了，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新北大公社的系级组织为‘战斗团’，西语系的新北大公社组织间称为‘红10团’），

¹ 《十年风雨纪事》，第51页。

俘获了大约 30 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 10 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 28 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¹

在此次武斗中，两派都有同学受伤。流血使派性斗争迅速升级，武斗的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7.28”毛泽东召见。

北大这颗钉子终于被拔掉了，红卫兵运动也由此寿终。■

附：

斗私批修，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谭厚兰

(在北师大 1967. 11. 15 晚召开的“斗私批修”讲用会上)

井冈山红卫兵战友们，解放军同志们，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毛泽东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在解放军同志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帮助下，通过参加毛泽东著作的学习，通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逐渐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自己确实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私”字经常在我脑子里存在，严重地妨碍我前进。在认识自己错误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林彪同志的“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份革命力量，同时，又

¹ 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载《记忆》152期（2016年3月31日）。

要不断地把自己当做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这一教导的深刻含义。今天，想把最近的学习，我对前一段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的根源，以及沉痛的教训，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由于自己平时没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充分地改造世界观，因而，在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身上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八九月份那一段，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是很难过的。由于我的错误的严重性，给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师大文化大革命，给巩固师大的红色政权，给我们井冈山的广大红卫兵的名誉，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对不起毛泽东，对不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不起井冈山红卫兵战友和广大的师生员工同志们。这一段来，很多同志，包括现在兵团的许多革命同志进行了及时的严厉的揭发和批判，这对于挽回由于我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我表示最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并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作更加严肃的尖锐的批判。我想主要谈谈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林杰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和有的同志，对林杰、吴传启、卢正义等人直接和间接打过交道，特别是和林杰工作上的联系比较密切，并且一度在不同程度上或者为他们辩护，或者干脆死保他们。毫无疑问，正如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立场错误，在这个问题中间的核心问题是林杰问题。在我和其他一些坏人打交道中，林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文化大革命舆论时期，在批判三家村时，我和一些同志在红旗杂志社同林杰一起工作过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直和他有联系，直到“九·七”事件前，我们与他的关系，同志们大致是有所了解的。应该承认，我们同林杰的接触是很多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许多问题都受了他许多影响。首先是在北京两大派问题上，自从二月逆流以后，在北京逐渐比较明确地分成了两大派，也就是发展到后来的所谓“天派”和“地派”。这两大派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中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我们在反对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上来看是一致的。在前进的道路上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错误多一些，有的在那个问题上

错误多一些，这两派之间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有的原则性分歧，有的是非原则性分歧。这些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可以“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即双方都本着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是完全可以团结战斗在一起的。但是林杰等人在这中间，就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采用了拉一派打一派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抓住我们的私心，煽起我们的派性，扩大分歧，加深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直接受其利用的，因而犯了很大的错误。这里我想简单地举几个例子，说明他是在那几个问题上插手，因而扩大两大派分裂的。

第一是在北京日报的夺权斗争中。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全国都掀起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高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参与了北京日报的夺权斗争。但是我们自己是带着私心杂念，带着小团体利益不可侵犯的严重的宗派情绪跑去帮人家夺权的，这本身就已经有错误了。又认为自己在夺权问题上原则是对的，置革命派大联合于不顾，与北航红旗的革命战友吵起来了，本来解决了就完了，但林杰公开讲话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样一来，我们是有恃无恐的，因而双方打得更欢。以至于闹到中央首长那里，从此双方伤了感情，一直存在着隔阂。

第二个是在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在教育部我们支持延安公社，北大支持北京公社，也吵得很厉害，但林杰也是无孔不入地发表意见，加剧了矛盾的发展，甚至还去慰问我们被北大打伤了的同志，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把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卢正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北大的同志指出卢正义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决同他划清界限。但我们却出自派性，再加上林杰的支持，不但不接受新北大同志的意见，反而一意孤行，公开为叛徒卢正义辩护，说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说他是叛徒的材料“不充分”，“当时他还很年轻，没有形成定型的世界观”等极其错误的论调，根本不愿意去进行调查研究和作认真的阶级分析。在卢正义问题上犯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听

信林杰的话，把敌人当朋友看待，这是立场性的错误。

第三个讲一讲七八月份在揪刘火线上，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又和北航发生了分歧。本来在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斗争这一大前提下，顾大局，识大体，谦让一下就没有什么了。但我们却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对北航刚一到就想当主席，就打抱不平，这时林杰就别有用心地挑动说：“没有北航，你们就开不成会？就革不了命？”就这样在敌人面前，各拉山头，造成严重的分裂局面。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再一个就是在学部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受到林杰许多坏影响的，我们是上了当的。对于潘吴，我们过去根本不了解，又根本没有作调查研究，我们没有想到学部有那么复杂。由于林杰与潘吴这些反党分子勾结紧密，因而我们也就和潘吴发生了关系，我们最早和学部发生关系，是从批陶铸开始的。联系比较多是在二月逆流到社会上反潘吴这一段，直接和潘吴接触也是这一段。这一时期，我见过吴传启四次面：第一次是高教部夺权，第二次是在民族文化宫，搞一下什么北京市委员会，给中央文革小组一封建议信，第三次是二月反二月逆流时，吴传启来到了我们学校，说他们掌握了李富春同志很多材料，他们要先搞谷牧、薛暮桥，让后再搞李富春。第四次就是在体育馆参加“七一”批陶大会，兵团所展览的那张照片是在那个大会上主席台上照的，大会上通过王恩宇介绍，才知道学部有个潘梓年，见到潘梓年，我就只那一次。由于我和林杰接触多，又介于我们对林杰的信任，因而我们和学部一度接触较多，再加上潘吴这些特务叛徒别有用心地利用我们，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和他们拉在一起，好招摇撞骗，便于他们可耻的反党活动。在这里，向大家交待一个事情，就是在二月份时，王恩宇用中央文革名义，从我校邀请了二十几个同学作调查组，调查中央各口的情况。现在看来，这个调查组问题很大。而我一方面是听信了他们说是中央文革调人，一方面也是由于相信林杰的缘故，因而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阶级斗争观念差，而犯了错误，帮了敌人的忙。基于卢正义问题的教训，当四月份社会上揪潘吴时，我没有轻率地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看到北大、三红整理潘梓年的材料，看了潘梓年从二八年到四八年，一味吹捧蒋介石，攻击鲁迅，我当时一看，就认为他和吴晗差不多，是个

反共老手。当时社会上也说吴传启历史很复杂，当时我觉得吴传启历史复杂，要搞调查研究，要少和这些人打交道。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主动和学部打交道了。由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派性十足，在以后这一段实际工作中，仍然和王恩宇他们打过一些交道。

毛泽东教导我们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而在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相反和毛泽东的教导背道而驰，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派性立场上，也就是基于这样历史性的派性错误，致使我在“九·一”到“九·四”又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也就是林杰问题被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对抗中央战略部署，从小道捅出，企图把水搅浑，破坏文化大革命，而我就上了敌人的圈套，一度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实质上起到对抗中央的作用。同时也由于我的错误，使革委会和许多同志都犯了错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这里顺便说一下，许多同志，特别是校革委会的一些同志，由于我的过错使他们犯了错误，使他们受到了委屈，我是很难过的。我为什么会在九·一～九·四之间插手了林杰问题，保了林杰，一度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扰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呢？我犯错误，主要是由于私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发作，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头，派性就代替了党性，以派性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抓住了事情的表面现象，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毛泽东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在林杰这个问题上，我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这一教导的。由于我是以私、以小团体利益、以私字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就看不到林杰问题的严重性，又由于我们和林杰之间联系密切，以前别人也把林杰叫做我们的小后台。

毛泽东说：“小团体主义是放大的个人主义。”我之所以在那些日子里保林杰，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怕林杰发生了问题，牵涉到小团体利益，牵涉到个人的利益。当时当听到外面有人要打倒林杰，并说他是反革命两面派，

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心里想，搞了一年多了，难道和一个反革命两面派搞到一块了，不敢正视林杰问题。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我对林杰在当时还划不清界限，从阶级根源来讲，是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思想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软弱性，特别是不能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也就决定了我跳不出那个圈子，就看不清斗争的阶级本质，也就决定了我划不清界限，也就决定了我犯保林杰的错误。从世界观来看，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利己主义的，就是私字。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自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必然在林杰问题上顽强地表现自己，表现在行动上，在以前开大会保林杰，开广播车发表声明，到红旗去，本来是保卫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坚决搞大批判的游行队伍，中途也擅自决定拉到红旗去，同时还说什么“和林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什么“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什么“我们信得过”，这些都是错误的。在这期间林杰的老婆王乃英来师大探听消息，也接触过，也接待过。学部的王恩宇本来来探听消息，也接待过。因而造成了这一严重的政治错误。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我现在的认识已经向中央文革汇报了，并且请求组织上的处分。同时也愿意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判。在这一两年来的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由于私字作怪，而且又不能很好地克服，自己最近受了林杰和其他坏人的利用，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象某些人听说的那样，我是林杰反党集团的成员，直接参与了许多反党活动。这一点，我可以对党对广大革命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负责。

第二个问题是对待总理的态度问题。今年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夺权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夺权，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决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从极“左”的和右

的方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今年二月，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股逆流是从右的方面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为了誓死保卫毛泽东，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我们英勇的井冈山红卫兵战士和社会上广大革命派战友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展开了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反击，由于我们广大战士和兄弟院校的广大革命战友以及广大的工农兵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形势发展的新动向、新问题，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粉碎了以谭震林为代表的来自极右方面的复辟逆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师大井冈山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毛泽东说：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要防止“左”倾，在打败仗和外人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在取得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出极“左”情绪的。那时当我们调查发现有人反对毛泽东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感到非常气愤，决心和他干到底。但这时发现从右的方面表现出来的反动势力比较严重，发现有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同时由于批谭有成绩，头脑就不冷静了，不但要打倒谭震林，还打倒余秋里，同时还支持别人打倒陈毅，炮轰李先念，那时我们对谭震林、余秋里掌握了很多材料，但对陈毅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并不很了解，但心想，我们是红卫兵组织，反正是造反，犯点错误也没有什么，能打倒就打倒，打不倒就拉倒，反正轰一轰没有错，自己思想里有个宁左勿右的想法。自从这个情绪，对几个副总理摆开了阵势。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好学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跟着毛泽东南征北战，在早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掌握得很好，他及时地发现了这种倾向，他一面从爱护革命小将出发支持了我们的革命行动，肯定了我们的方向，一面指出了对于他们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对此很不理解，也就是我行我素，听了总理的指示后，我思想斗争仍是很激烈的，认为总理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讲话的，但我们的行动与总理的指示是相矛盾的，怎么办？结果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采取实用主义手段，并千方百计地找出借口，说什么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不同于我们，说话要稳重，如果说余秋里可以打倒，那就没有什么群众运动了，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后来总理再三教导我们，我不

但没有认真去思考，紧跟主席思想，及时改正错误，反而受了社会上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总理指示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走，就自我辩解，同时以我自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对待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和科学性，结果十分错误，主观主义的认为，总理没有中央文革革命性强，没有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当时想总理是毛泽东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又十分错误地认为周总理是不太坚定的，得出这个十分错误的结论后，还自以为是，就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在作战部的一个声明里确实把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坚定的”三个字划掉了，这是我对总理错误态度的大暴露。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对不起毛泽东，对不起周总理，特别是想到周总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紧跟毛泽东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心里就很难受。我决心以今后的实际行动来纠正这个错误，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关于外面大字报中的许多铁证，什么我整了总理的黑材料，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对待总理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不坚定。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动摇和分裂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五·一六”兵团，就采用把总理和中央文革对立起来，恶毒地、离间挑拨的卑鄙手法的“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教员，从反面给我极大的教训，我认识到我那种错误思想的严重性，我也认识到了周总理不仅是无产阶级司令员，而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周总理是毛泽东非常得力的助手，很好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我要就我对周总理的严重错误、对总理态度的严重错误，向总理和中央文革请罪。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严肃的批判。

有人说，我们是“五·一六”兵团的重要成员，师大“井冈山”是“五·一六”的黑据点，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一点，我可以向党中央向同志们负责。

第三个问题是我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的问题。同志们在斗私批修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要害的问题。一小撮别有用心家伙

制造的“九·七”反革命事件给了我极大的教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给我触动很大，毛泽东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就是因为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我现在也知道这些东西，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例如在上面发号施令的时间多了，以一个普通小兵到群众中去的时间很少。除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学校大的方针，不是首先把政策交给群众，想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向群众请教，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自己想一套硬贯下去，处理很多问题，不是首先听取下面群众的意见，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有时就凭一知半解的东西，主观地决定问题，处理问题。

毛泽东教导我们：要成为好的领导，作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还得对自己的工作对象、工作环境，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工作若明若暗，一知半解，或者全然不了解，就在那里哇哇啦啦议论，在那里发号施令，指挥别人，工作必然做不好，群众将会起来造这个领导的反。由于自己的工作主观，当然就有同志造反，提出不同意见，而自己对那些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对于一些同志的错误，而自己不是热情地去帮助他们，有时或者采取粗暴简单的态度，或者甚至训人，或者采取疏远的态度。在革委会工作中，我们民主作风也是很差的，有些事情不是经过常委会或委员会集体研究，而且自己或者几个人决定，有许多事只是一两个人知道。干了些什么也不搞汇报。前一段作战部在对外问题上都是这样做的。比如在对待财经学院问题上表现出很突出。这也是我犯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犯了错误，而在较长时间得不到改正的重要原因。我知道，现在许多同志对我是有气的，一方面是我犯了错误，给党的事业，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而另一方面是我严重地脱离群众，以至于在“九·七”事件中很多群众发生了动摇，这也是由于我经常不到群众中去，群众不了解我缺乏民主作风，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因此同志们在“九·七”事件中犯了错误，不应该由同志们来承担，应该由我来承担。从某种意义上讲“九·七”事件是对我脱离群众、缺乏民主作风的错误的很好地惩罚。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

风，实质是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是公字当头还是私字当头的问题。一个私字当头的人，他既不可能正确对待群众，也不可能正确对待自己，他就不可能时时刻刻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把功劳归于自己。作为高于群众之上的骄傲自大的资本。

井冈山红卫兵战友们，解放军同志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泽东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要依靠学校中广大的革命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一最新指示，体现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的希望和最大的信任。这个英明的指示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且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

结合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主席这个最新指示，检查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自己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他受压抑的时候，为了自身的解放，有一定的反抗性，小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反对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有限的，一旦改变了受压抑的地位，自己自满自足起来或飞扬跋扈起来，或者逍遥自在起来，不是吗？在一年多以前，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年多以后地位改变了，并且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一片胜利声中，自己被冲昏了头脑，飘飘然起来，满以为自己了不起。在林杰问题上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骄傲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上没有请示中央，没有认真学习中央指示，下面脱离群众。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正是违背了这两条原理，必然站错了队，必然违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范畴，往往是带着“私”字造反，“私”字膨胀，派性发作时劲头十足，他总是从个人和本派的利益出发观察形势，权衡得失，常常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很容易受阶级敌人挑拨煽动，我们在北京两大派斗争中，不正是这样通过自己学习最高指示，通过自己犯错误的严重教训，我深深感到狠斗“私”字，彻底改造自己世界观是多么重要，不狠斗“私”字就不能永远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

东的革命路线，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狠斗“私”字，就不能正确的认识分析形势，就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甚至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不狠斗“私”字，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在我犯了这一系列错误之后，在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也是有许许多多活思想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原来一向自信，很骄傲，总觉得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这次突然犯了个大错误，思想很苦恼，同时产生了一个活思想，就是觉得非常委屈，认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犯了错误检讨了，改正了也还是通不过，还要作第二次检查。思想上就是有些顶牛，因此对自己的错误总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总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包袱越背越重。在解放军同志和革命战友的热情帮助下，用最高指示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对待自己的问题。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当我想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具体领导下，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师大的伟大胜利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我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这就是当我们犯了错误，特别是当我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党中央还那样坚决支持我们和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毛泽东、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九·七”通告，谢胡、希尔同志来校访问，教育方案的发表，“九·七”事件以后，周总理同中央首长的讲话都一再支持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切多么使人激动。我想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正视自己的错误，迅速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我应该听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说：“以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特别是我自己犯了错误以后，我就特别，我出身一个贫农的女儿，没有党就没有一切，没有党就没有今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党中央一直关心师大，至于在运动中打成反革

命，也是党中央、毛泽东来解放我们的。使自己越想越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为党做什么事情，但是又那么骄傲。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毛泽东对我们抱有那么大的希望，自己犯了错误又不肯改正，自己越想越对不起毛泽东，对不起党中央。在反复的思想斗争中，特别是在解放军和革命战友帮助之下，想到自己要很好的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应该挺起腰杆继续干革命。因为毛泽东、党中央为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为毛泽东、党中央争气，一定要不辜负毛泽东、党中央的期望。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生为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要为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献身，天崩地陷顶得住，海枯石烂不变心。对自己在这个思想斗争中，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是不认识的，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自己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

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毛泽东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红色风暴正在席卷全国。我们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发扬应该继续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彻底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建立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教育体系，为在教育战线大树特树我们伟大统帅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贡献我们的力量而英勇奋斗。最后让我们高呼：（口号略）■

【评论】

从高云鹏“判刑”真相谈起

何蜀

读到《记忆》155期上高云鹏澄清他被“判刑”传闻的真相及相关史实时，刚好读到了5月4日《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希尔斯伯勒惨案与现代的安提戈涅》，其中这段话引起我极强的感慨：

……在长达数十年的过程中，那些敢于讲出真相的人耐心地、缓慢地、最终成功地摧毁了一个巨大谎言的残忍力量。

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小小的发声者挺身而出，反抗国家及其政治的权力和权威，胆敢说出‘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安提戈涅的故事，出自雅典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大约公元前442年写成的戏剧。

读到有关高云鹏的故事时，我就想到，这不是又一个类似的故事吗？不同的只是，希尔斯伯勒惨案是那些死难球迷的亲属坚持不懈地说出真相，推翻了谎言，而高云鹏说出的是有关他本人几十年前的一部分文革经历的真相。我对北大的文革情况不了解，所知的一点点信息都来自多年来陆续读到的各类出版物。其中，对高云鹏的了解主要来自那本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王学珍等编的《北京大学纪事》。从那里得到的印象，高云鹏是一个穷凶极恶、欠有血债的“武斗总指挥”、刑事罪犯，但后来在《聂元梓回忆录》中，看到她所写到的高云鹏却不是那样的人，就曾希望能有人向她提出：再多写些高云鹏的真相以正视听。因为我一直以为，高云鹏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现在才知道，高云鹏不但还在人世，而且还能站出来澄清史实。那些有关他被判刑甚至判死刑的传闻根本就不是真相，甚至连本意是为他辩护的聂元梓也被蒙骗，而在回忆录中代为扩散了高被判刑的谎言。

亲历者能自己站出来说出真相，太重要了。多年来，在收集了解文革史实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人：拒绝回忆。他们对官方宣传的文革历史嗤之以鼻，对自己被强加的罪名耿耿于怀，但就是不愿意站出来澄清真相，宁可让那些他们认为不值一驳的谎言继续流传。这是很奇怪的。其实许多历史谎言都确实是不值一驳、不堪一击的，只需亲历者如实讲出哪怕是一部分真相，许多疑难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人们就会恍然大悟。

希望有更多的高云鹏能站出来发声，讲出真相。这也就是陆小宝所说的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评论】

给俞小平的一封公开信

章铎

俞小平学友：

你在《记忆》152期上刊登的《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一文，我非常认真的读了多遍。从你的字里行间里，我深切地感到：你想好好地总结北大文革的愿望是真诚的。尤其你在文中关于3.29武斗的亲历，给我们揭示了如下一个事实：“不仅31楼，40楼也打起来了，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28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真的很谢谢你，因为这是我至今看到的唯一的一篇井冈山人说自己对武斗有准备的文章。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如今，由于一些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文革史了解的匮乏，竟然开始呼唤文革了。因此我赞成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写下自己经历的文革事件，共同还原文革的真相。”

我和你一样，都是1963年考入北大的，经历了北大文革的风风雨雨。我的经历和你不大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许会和你有很大差别，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给历史留下我们所知道的真相。

（一）我的文革经历

1966年6月上旬，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陆平党委立即被打倒了。中央文革赶走了张承先工作组后，北大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成立了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校文革。不久，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结伴，两次坐火车外出串联。先后到过韶山、萍乡、南昌、重庆等地，都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我们还去过大庆，参观了大庆油田，向王进喜等先进人物学习。12月9日，我和周玉琢、黄世强等八人组成了长征小分队，进行了一个月的徒步串联。我们沿途访贫问苦，向群众宣传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白洋淀等革命根据地接受革命传统的教育。虽然脚上都打了不少的泡，但我们仍然斗志昂扬。记得1966年12月26日那天，为了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我们天不亮就出发了，走了一百多里路，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向毛泽东的生日献礼。我们经常唱的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后来接到通知要我们回校参加军训，我们就从邯郸坐火车回来，那时已是1967年1月上旬了。



图一 长征小分队（1966年12月9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合影）

左起：顾大明、黄世强、曹静芬、周玉琢、章铎、曹铮、李棉生、林传贤

回校不久，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到了新北大公社动态组，负责了解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学部的文化革命动态。在动态组期间，我了解或经历了“1.15 抢档案事件”、“高教部 2.2 夺权事件”、“4.8 民族宫事件”、“4.11 事件”等等。对 4.12 孙蓬一在大饭厅讲话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我是衷心拥护的。陈伯达“6.5”讲话后，北大大乱。尤其 1967 年的 6、7、8 三个月，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为我了解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陈伯达的“6.5”讲话没有改变我看问题的观点，毫不动摇地留在了新北大公社。我厌恶那种打、砸、抢和冲会场的行径。1968 年 4 月 25 日，井冈山进攻 36 楼时，我也被赶出 36 楼，除了被褥，我失去了所有的书籍、笔记等。在北大读了几年书，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实在是件憾事。

对于 1968 年 3 月下旬的北大武斗，我至今仍然认为是有深刻背景的，不是“聂、孙挑起武斗”这么简单的事情。随着历史档案的揭秘，我想，真相终会大白天下。

另外，我根据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和对孙蓬一的了解，写了《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一文，刊登在《记忆》139 期上，我认为你肯定看过了，很想听到你的指教。顺便提一下，

你刊登在《记忆》上的“家书”，我都认真看过。我好羡慕你，你妈妈把你的一切都保留得那么好，而且你还能悄悄溜回在南京的家。而那时，我的母亲正随同兄嫂所在的煤田地质勘探队住在南京栖霞寺内。我虽然不参加武斗，但没有条件回南京看望母亲，只能滞留在武斗的环境中。

和你商榷几个问题

1. 关于北大校文革

你在文中说：“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井冈山兵团成员不承认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

众所周知，1966年7月底至8月初，中央文革赶走张承先工作组以后（请注意：北大工作组不是被北大“造反派”赶走的），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校选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1966年9月9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2个正式委员、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它是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校文革成立后，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从1966年10月6日路远、周闯的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到反对校文革的“井”、“红”等等，他们都认为聂元梓“太右了”。历史事实证明，1966年的聂元梓是紧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极左路线的，而反对校文革的人则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

1967年2月，按照当时《人民日报》有关文章的精神，许多高校开始整风。与此同时，在北大军训解放军的帮助下，红旗兵团、东风兵团、北京公社等组织联合成立了按系统组建的新北大公社。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牛辉林为首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及其他一些人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外，当时的北大，基本是支持校文革的一统天下。

1967年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北大社教左派）贴出了《北大要整风，聂元梓

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很尖锐，但总的出发点还是帮助校文革、爱护校文革，并没有人提出要夺校文革的权。

1967年4月11日下午，地质、农大等六所院校开了六辆广播车到北大闹事。他们高呼“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等口号。因为是打到自己家里来了，北大绝大多数同学都很气愤，大家齐心协力，将他们的广播车推出了南校门。

1967年4月12日晚上，全校召开誓师大会，孙蓬一代表校文革在大会上讲话，这次讲话的重点就是向吴传启一伙公开宣战，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

1967年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学院的矛盾。对谢富治偏袒地质学院的做法，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很有意见。当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4.11”事件对北大表示声援。在大饭厅，自发地聚集了不少北大同学，孙蓬一登台即席讲话，引发了炮打谢富治事件。

对于1967年4月11日至13日这三天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包括你我在内的广大北大师生，都不可能忘记。因为这对以后北大文革的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尤其孙蓬一在4月12日公开向吴传启、洪涛等人宣战，直接触动了中央文革。自此以后，聂元梓、孙蓬一就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各种批评。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北大“炮打谢富治”大做文章，不断掀起反对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新北大的浪潮。但在陈伯达“6.5”讲话以前，北大校内反对校文革的势力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就连人数较多的北京公社，也只是提出帮助校文革整风，没有夺权的企图。

现在看来，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人，向吴传启们公开宣战，向中央文革告关锋、王力等人的状，早已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如扬子浪在他1967年8月15日的日记（刊登在《记忆》132期）中写的那样：“最近北大气氛又有变化，沉闷得很。中央首长批评北大、限制北大。北京市这两大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我总预感到某种不幸和危

险，总觉得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离中央文革越来越远。”

1967年陈伯达“6.5”讲话以后，北大开始大分裂。反对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其宗旨就是要“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专政，摧毁臭名昭著的新北大公社”（参见北大井冈山兵团编辑出版的《新北大报》1967年8月30日社论）。一句话，就是要进行“二次革命”，夺校文革的权。

在1967年8月30日的这期《新北大报》上，还刊有斗争谢甲林的消息（见图二）。不知你认真想过没有，井冈山兵团的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1967年的6、7、8月是北大反聂派最活跃的时候，校外反对聂元梓和孙蓬一的呼声也甚嚣尘上。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离开北大不久，就发生了砸、抄学校保卫组（简称二组）的事件。我将蓝绍江写的一篇文章录在下面，请你参阅（此文由扬子浪从美国发来）。

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

蓝绍江

最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篇文章，名曰《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注明来源是《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发布时间为2010年8月11日，作者“薄亚达”（估计是化名，取北大“博雅塔”谐音）（见本刊zk1008b——编者注），该文中提到了北大1967年7月10日的群众“造反派”组织查抄北京大学保卫组事件，原文摘录如下：

反聂派一旦派生，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进行平反。7月10日，北京公社查抄了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学生、教员为反革命的“黑材料”。此事震动了全校，周培源闻讯赶到了现场，见状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挥起拳头，高呼道：“毛泽东万岁！”、“毛泽东革命路线万岁！”……

看完这段文字叙述后，我突然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些人带着根深蒂固的“文革”烙印和派性发表些貌似公允的史料，若都如此，再历经若干年，后人只能依据一些偏颇、失真的史料审视和评价那段特殊的历史，岂不要误入歧途？为此，我把自己亲身经历“文革”使得北大保卫组和北大“7.10”事件公诸于世，以纠正因情绪偏颇而失真的一点点史料。

首先简介一下当时的北大保卫组和我是怎么到的保卫组：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开始沸腾。当时我们法律系63级学生还在郊区参加“社教工作队”，被连夜召回北大。一进学校就懵了！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到处揪斗老师、揪斗领导，而且伴随着侮辱、打骂，学生也因不同的看法而互相“辩论”，校园里从早到晚一片混乱！不久，中央派了工作组进驻北大。有个人总是出现在揪斗干部、教师的现场，制止武斗、宣传“文斗”，我很佩服那人的胆量，敢在那种极端无政府状态下挺身而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后来听说那人叫“张承先”，是工作组组长。可是到了1966年7月25、2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东操场主持了两次“大辩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等等等那些重量级人物全来了，最后他们在大会上宣布工作组是“镇压革命”，宣布张承先，还有张文秋是“坏人”，宣布撤销工作组。

工作组撤销了，但是工作组时组建的“保卫组”（当时称“二组”）因保卫工作的特殊需要被批准保留下来——当时“二组”是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组成，不参加学校“文革”运动，专门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承担重点专家、要害部位及来校首长、外宾的警卫）。就在1966年8月初，我接到系里通知，到二组参加保卫工作。我记得当时抽调校内人员一共三个人，有两名原来的学校保卫干部，学生当时只有我一个（因为我从未写过大字报、从未揭发批斗过老师）。从此我就同安全保卫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整个“文革”期间循规蹈矩地工作，没有参加过一次批斗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出去到各地“大串

联”；但是我却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从部队、公安、老保卫干部那里学到了勘验、照相、文检等业务知识，（1968年12月毕业离校）毕业后因此进入了公安刑警队伍。

1966年底，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学校又陆续抽调了部分教师、干部充实保卫组，正式取消二组称谓。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当时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学校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独立工作，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保卫组从来没隶属于任何群众组织，包括“新北大公社”，前面摘引的文章中提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又称二组）”的称谓纯属编造。

1967年7月9日是星期天，保卫组长谢甲林回家了（在市内），我和董希成等两个住校人值班。7月10日凌晨约3点钟，我听到保卫组（燕南园63号）院外人声嘈杂，又看到不少学生宿舍开着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出来到校园巡查（巡查校园是我们的职责）。我顺着声音方向来到了“大饭厅”（学一食堂），里面灯火通明，饭厅中间一大群人席地而坐，陈伯达就在中间（陈伯达何时来北大，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我扫视一圈，发现许多群众造反组织负责人都在现场，七嘴八舌地争相向陈伯达汇报和互相争论。我只顾注意巡视周围，害怕出现安全问题，对他们具体争论什么没太上心。就在将要结束时，忽听在场的一个人叫“雷振孝”的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当场有人鼓掌。听后，我为之一惊，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在他们还没有散去之际，我匆匆回到保卫组，叫醒值班的其他人，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情况，大家都明白，马上就会有大批人蜂拥来封门、“抄家”。我们担心保卫组的档案资料被盗抢丢失，里面有“文革”开始以来校内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案卷、“文革”开始以来校内自杀人员现场勘验资料、警卫工作记录、中央及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保卫工作的通报、文件、批示等重要材料，还有一部分为侦破校内刑事案件开展笔迹筛查、鉴定而从有关系

部门借来的档案、大字报底稿等文字资料（作为笔迹样本）。我们对最后这部分资料的具体内容不清楚，而且必须用后归还各部门，不能丢失、扩散。当时我们估计到已经被包围或监视，资料已经没有时间妥善转移。于是，我们两个年青人商定，把这部分搞不清内容、又必须归还的文字样本资料包裹严实，暂藏到院内和卫生间等处，打算过了风头再起出归还。

果然，天刚亮就来了大批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尽管我们一再解释，保卫组不介入群众组织派性活动、保卫工作资料的重要性和保密性等，但是毫无效果。等谢甲林同志来了以后，我们就被全部被“净身”赶出保卫组，保卫工作业务档案、勘验与摄影器材及个人物品全部被扣留（北大的保卫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因工作需要而被批准恢复——此是后话）。

事隔半个多月之后，突然有大字报贴出报料：在“黑二组”查出被隐藏的“大批黑材料”！我知道是我们暂时隐藏的借阅资料被发现了，遂向谢甲林同志作了汇报。我们保卫组当时的工作纪律是：每个人思想上可以有“观点”，但工作中不能有派性，保卫工作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正因为我们不搞什么“黑材料”，自己心里有底，所以我们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任何组织能拿出保卫组构陷群众的“黑材料”公布于众。至于周培源当时是否激动得挥起拳头，并高呼道：“毛泽东革命路线万岁！”我不知道，当然这也绝不是什么“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因为这是陈伯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果。

我早就丢弃了派性（1967年7月10日以后曾有过），我觉得当时的“派性”实在幼稚、无聊，我和我的同学（无论当时何派、何组织）相处得一直都很融洽。我也希望现在还有些当年派性痕迹的同学、学者，摒弃幼稚可笑的“派性”思维，用严谨的态度和理性的语言文字客观地记录那段特殊岁月的史实，以利于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共同构建社会的和谐、推动祖国的发展，绝不要再让陈伯达们的幽灵继续游荡了！

(2014年元旦)



图二 《新北大报》1967年8月30日局部

校内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呼声很高，同时，社会上反对聂元梓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据聂树人所著《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一书披露：

1967年7月某日晚饭后，周景芳来到了地院。他谈到，全国解放后至今，我党曾出现过“五个反对毛泽东的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二个圈子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第三个圈子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第四个圈子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以上这些反党集团都形成了反党的圈子，他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集结了相当的势力。但是，在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他们都失败了。

现在，又有一个反毛泽东的圈子正在形成和发展中，这个圈子就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有金字招牌的人，他们与刘邓司令部的人暗中勾结，听命于他们，到处伸手，网罗势力，准备有朝一日与毛泽东摊牌。这个圈子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图穷匕首现的，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周景芳的这段讲话，真是太耐人寻味了。现在看来，到了1967年7月左右，中央上层已有了打倒聂元梓的意图，只是因为聂元梓还有一块“金字招牌”，便把孙蓬一当作替罪羊狠狠地打了。北大校内的反聂夺权活动，绝不是孤立的行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被蒙在鼓里，傻傻地在那里“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当年的我们，怎么就那么幼稚可笑又可悲呢？！

2. 北大武斗谁之过？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倒台了，当时新北大公社人人喜上眉梢，但井冈山兵团的人却不知所措。正如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事态发展到1967年8月底，毛泽东果断地隔离了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对当时的错误浪潮我没有认识，对毛泽东处置纠正错误的斗争方向，我不能理解，还在部分群众组织召开的会上发出抱怨。”

（《王大宾回忆录》，第165页）

但是，中央对王力、关锋等人的罪行一直没有进行公开揭发批判，报纸上只是号召大联合。当时北京日报的通栏标题是：旧话不再提、旧账不再算、责任不再追、共同朝前看。我不清楚这个口号是谢富治还是更高一级的领导提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口号，从来就没有实行过。

1968年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想解决高校的联

合问题。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致认为：北京市高校两派的分裂，是由于王、关、戚造成的。当时各高校的头头都在学习班，是解决高校共性问题的最好时机。如果能对这些共性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那么各个学校自己的问题回去就好解决了。但是，学习班的领导不让批判王、关、戚，认为谁批判王、关、戚，谁就是派性发作。而聂元梓等人则认为：压制对王、关、戚的批判，搞无原则的联合是右倾的表现。于是，由魏杞文（历史系教员）执笔，写了一份《对派性也要进行分析》的材料，并以“独立寒秋”、“傲霜雪”两个战斗队的名义上报。1968年3月7日开会时，江青想要这份材料，因手头没有，就让谢富治派人到北大拿一份。谢富治将这件事交给傅崇碧去办，傅派了一名叫哈斯的军官来北大。北大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材料都已上报，没有了。当时哈斯态度很强硬，质问把材料都上报给谁了，随后拿走了写有毛泽东名字的名单。聂元梓认为哈斯这样做是犯规的，性质很严重，遂打电话给江青，说“有要事报告”。3月8日，江青和陈伯达接见了她（这就是所谓的“哈斯事件”）。在接见时，江青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江青没有说后面大的是谁，但肯定不是她说的“刘少奇嘛！”根据江青的这次讲话精神，聂元梓制定了“打死的，看活的”方针，打破学习班不许串联的禁令，公开在学习班活动，搞了两次大的串联会。

学习班领导李钟奇在学习班大会上发言“你们不要老是讲阶级斗争吗？”，小辫子一下子被抓住了。学习班是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联合主办的，火自然烧到谢富治身上。反谢时表现最突出的单位，一是师大造反团，二是清华4.14。清华4.14在1967年9月前属于“地派”，但是他们对谢富治、戚本禹的意见很大。后来高校学习班的领导对反谢的事件进行反击，把批判王、关、戚，说成为“二月逆流”翻案，批判谢富治是动摇北京市革委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一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杨、余、傅倒台。会上，林彪还莫名其妙地讲了一段杨成武和聂元梓的关系。

据北航韩爱晶2015年1月20日给我们的来信相告：“1968年3月20-29日，市革委会批判聂元梓，是属实的，谢富治没出面，是吴德组织的，就是开会，他也不直说，看样

子是会前有布置，有人准备好的发言，冲着聂元梓。我是慢慢才听出味来。李冬民发表了不满的言论，保护聂元梓。我没讲话，因为在市委学习班聂元梓倒谢，我不赞成也不参与。”

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批判聂元梓的同时，全市掀起了一场反聂元梓的行动。1968年3月25日前后，除了一些高校，还有机关、工厂、农民等组织举行游行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就连北京卫戍区也出动了。胡宗式亲眼看到一条大标语：“打倒聂元梓！北京卫戍区”，它贴在颐和园铜牛出口外一户人家的院墙上（当时是平房）。对这条标语，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这条标语的落款是“北京卫戍区”。当时部队机关介入文革，写的标语、传单，落款都是群众组织，如军艺“星火燎原”，高等军事学院“红联”，直接署名北京卫戍区的标语，这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空前反对聂元梓的阵势，真是来头不小，够吓人的！

1968年3月27日下午，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她在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泽东、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再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剥夺革命群众向毛泽东、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问题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对比江青在3月27日的讲话和3月8日的接见，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前后有不同的解释。3月8日接见聂元梓时，江青几次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这是鼓励聂元梓在学习班兴风作浪。在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却说：“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这是指责聂元梓：谁让你闹的？！“一批二保”，首先是批。这就是北大武斗的背景。

《北京大学纪事》关于1968年3月下旬外校来北大游行示威和武斗的情况的记载，想必你都有所了解，此处不再赘述。

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孙月才所著《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有以下记载：

3月18日 星期一

昨夜12点到今晨4点，双方发生武斗，〔井〕与公社战士都有受伤的。应尽量避免武斗，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3月22日 星期五

1点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向大家传达会议上的发言（注：指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吴德说，有人企图搞学习班，把矛头针对谢副总理，为“二月逆流”翻案），〔井〕在此前已传达并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孙蓬一〕，〔井〕大搞打、砸、抢，把我们十多个喇叭都搞掉了。晚上团长会议，成立武卫指挥部。

3月25日 星期一

下午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的打、砸、抢。新人大、农大都进校了，并打伤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

3月29日 星期五

晚发生大规模武斗，李钟奇副司令员、聂元梓被井冈山暴徒行刺。谢副总理、温玉成司令员来校制止武斗。并责令井冈山交出行刺暴徒。

3月30日 星期六

今晨2点左右，李副司令员来我总部，听取对学校武斗的意见。孙蓬一同志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李表示〔井〕要交出谋刺的凶手，如果不交，那么他要抓人。我们还对驻校解放军提出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支派不支左，这样下去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3、4点钟，交换双方俘虏。〔井〕被我俘虏者受到宽大待遇，不打一棍，均笑逐颜开，并写了认罪书，自觉地要求发表声明，造〔井〕的反。我被〔井〕俘的，都被打得不能走动。几乎人人被打破头脑，真是法西斯暴行。我们许多战士见了自己的战友都哭了。

陈焕仁所著《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记载：

3月28日 晴

我从食堂回来，公社和井冈山的高音喇叭一齐响了起来。井冈山的广播说，新北大公社是典型的“二月逆流派”，是一股“右倾保守势力”，杨、余、傅是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副总理，反对北京市革委会的黑后台，必须摧毁这股“右倾保守势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公社的广播说，井冈山是典型的“右倾分裂”和“右倾投降”产物，他们反对校文革，反对聂元梓同志顺应了杨、余、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投降的翻案逆流。

今天上午，双方趁势按照中央文革关于在思想上反对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在组织上抓黑手、抓坏人的号召，公社和井冈山一齐动手，互相抓伸向对方背后的黑手，抓钻进对方队伍中的坏人，和解救被抓走的“黑手”和“坏人”，终于重新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趁势拼命抢占战略要地，武斗从上午持续到晚上8点多，公社和井冈山各自占据

一些楼层，将对方人员赶走。

综上所述，北大3月下旬发生的武斗，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和中央上层的斗争紧密联系的。1971年3月4日，工军宣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坦白大会，在这个会上，牛辉林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在5.16反革命集团的指示下，在北大策划武斗。”其实，北大的武斗就是中央文革挑起的。作为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到武斗现场去制止武斗，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怎么会“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快意地观赏她的部下造成的后果”呢？

3. 我对“工宣队的检讨”的分析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9月，工、军宣队领导的全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11月21日，宣传队组织六百人会议，对聂元梓进行“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作了“严肃批评”。12月11日下午，宣传队在东操场召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揪斗了“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并在会议进行中将侯汉清拉上台，当场宣布隔离侯汉清。

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这些做法，显然是打击了一大片，对井冈山兵团中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打击，更是造成了很坏的结果。但这与“支一派（新北大公社）打一派（井冈山兵团）”挂不上钩。无论是63军为首，还是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是按毛泽东的旨意办事的，两个宣传队没有伯仲之分。

《王大宾回忆录》谈到，谢静宜在回忆录中披露：

1969年3月，毛泽东对聂元梓的批评与评价：“你‘老佛爷’伸手到石家庄，伸手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你们听了没？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你们今天，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自然会承认你的。现在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¹

不难看出，到了1969年3月，毛泽东已经对聂元梓充满了厌恶之情。1969年3月24日，他派出自己的御林军8341进北大，就是为了贯彻他的旨意。后来通过一个清查“五一六”运动，把所谓的“五大领袖”全部清查出去。在北大，聂元梓和孙蓬一都被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被无产阶级专政了。这一切，都是贯彻毛泽东旨意的结果。

可悲的是，当年的聂元梓还一直以为自己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7.28”接见时，还向毛告了侯汉清等人的状。想起这些，我都替她汗颜。

4. 关于对聂元梓判刑的问题

你在“做人的底线”一文中写道：虽然法院对她的罪行定性不准确，但是判她17年刑

¹ 《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67页。

期并不冤枉。如果聂元梓不忏悔她所犯的罪行，她就没有资格为法院对她罪行的某些错误定性喊冤。因为聂元梓还有你列举的六大罪状：

诬陷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保守组织”——诬陷革命群众组织罪；

策划并指挥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围攻井冈山兵团——策划并指挥武斗罪；

在北大、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内抓捕井冈山兵团成员——非法逮捕公民罪；

设立非法私刑监狱（牛棚）监禁北大师生员工——非法监禁公民罪；

在校文革设立的监狱里，以残酷私刑拷问折磨井冈山兵团成员——酷刑罪；

在校文革控制的区域纵容残酷的私刑迫害，致使三人死亡——纵容杀人罪。

对文化大革命中聂元梓自己干的事情，她当然要负起政治责任。但要把当时北大所有的坏事都归为聂元梓的错误和罪行，显然有失公允。如果按此推理，文革的始作俑者又该承担什么罪行呢？

文革到今年已经是五十年了，群众专政的时代早就过去。你从1989年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不知你是根据美国的法律还是根据中国的法律给聂元梓定了这六大罪状呢？要知道，现在是讲法制的时代，给人定罪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要依法办事。如果你真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聂元梓犯了上述六大罪状，也应该先向司法部门起诉她，由司法部门按相关法律和程序来处置。

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从成立起，到工军宣队进校倒旗止，也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各自组织都干了什么，早已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这些是任何人想抹也抹不掉的。但是，无论是新北大公社还是井冈山兵团，都只是一个群众组织，都是被毛泽东利用的工具，这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都是要负责任的。尤其在我们还原文革真相时，更要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个史实，做到文责自负，一旦发现错误，就要及时纠正。我想，这也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底线。

应该指出的是：对聂元梓等人的判刑，是发生在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陈云等人掌权的时代。通过对“五大领袖”判刑和清理“三种人”，文革中的所有造反派几乎被一网打尽。这不是冤枉不冤枉的事情，这就是政治！

5. 高云鹏问题

你在文中写道：高云鹏是校文革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他不但在北大指挥武斗，在此之前还在陕西汉中北大分校指挥武斗，真正的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的战争。他参与指挥围攻、爆炸汉中运输公司大楼，造成29人死亡。他被判刑十年是理所当然的。

校文革是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从来没有什么“文攻武卫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武卫指挥部是1968年3月22日成立的，负责人是你们年级的宫香政。如前所述，那时全市都在批判聂元梓，形势十分紧张，新北大公社此时成立武卫指挥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所写的关于高云鹏的上述文字，可能受到《北京大学纪事》和《聂元梓回忆录》的某些误导。

《北京大学纪事》虽然是我们研究北大历史不可多得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但它关于文革部分的记载，存在不少硬伤，不能作为信史；同样，对于《聂元梓回忆录》，也只能作为我们研究文革的一种参考资料，不能当作信史。对高云鹏的相关记载就是一例。

据我所知，1966年9月，高云鹏经群众选举当选为哲学系文革主任。1968年3.29武斗后，北大的局面十分紧张，聂元梓找高云鹏个别谈话，对他说：“学校近来发生不少事，公社都是年轻人，做事比较莽撞。你到44楼去把把关，别让年轻人太莽撞做出出格的事情来。”这样，高云鹏在4月份到了44楼。不久，地院附中就发生了学生温家驹被打致死事件，时间是1968年4月19日。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强行占据了36楼。4月26日，孙蓬一主张攻打36楼。高云鹏认为：硬冲是要伤人的，不能让公社的同志们豁出命来达到目的，不能下这个决心。但孙蓬一已经直接组织人员上了阵，结果公社伤了不少人。后来孙蓬一还是接受了高云鹏的意见，将攻楼的队伍撤了下来。

1967年5月，校文革应周培源和戴新民的要求，派高云鹏去汉中协助他们工作。去汉中以前，聂元梓交待高云鹏的任务是：“动员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数力系参加汉中文革的同学返回北京，脱离当地的文革。”高云鹏于1967年5月下旬到达汉中，很快便动员了大多数同学回京了。高云鹏到汉中是周培源接待的，但是，相处才一个星期，周培源就对他讲：“我和杨成武很熟，我要到北京找杨成武，让杨成武采取措施，解决分校存放的放射性物质的问题。我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就能回来，你在这个期间把分校的工作管好。”高云鹏对周培源是信任的，所以就答应了。但是周培源离开汉中后却没有回来，而且一再联系都联系不到他，派人到学校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周培源参加了“井冈山”，并当了“井冈山”的头头。直到校文革派唐春景（校文革常委）来接替高云鹏的工作，他才于1967年底回到北京。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宣传队派高云鹏到汉中主持分校工作，任汉中分校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底，他从汉中回到北京，休息一段时间后回到哲学系。宣传队对高云鹏在汉中的工作比较肯定和重视，想安排他到学校工作，但高云鹏没有答应，遂让他负责哲学系老教授们的学习。

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高云鹏签名。在大字报贴出来之前，高云鹏在上面签了名。不几天，迟群等人就把大字报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宣传队企图通过高云鹏揭出校文革、聂元梓幕后的秘密，为彻底打倒聂元梓、孙蓬一提供炮弹。于是，宣传队派人到汉中收集高云鹏的材料，并采取诱供的手段，编造了“高云鹏是汉中8.19炸楼事件主犯”的谎言。1970年7月27日，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会上，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了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处理的决定。在汉中南关期间，宣传队的副总指挥魏银秋多次找高云鹏谈话，以要不要活命相威胁，让他作假证，证明1968年7月20日刘玮被打死是聂元梓亲自策划的。但高云鹏宁死不作假证。为此，高云鹏受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四人帮”倒台后，一切真相大白。1980年，高云鹏从汉中回到北京，在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89年4月回到北大心理学系。从90年代起，高云鹏做了心理自学考试工作，在宣传心理学、普及心理学上有很大贡献。

高云鹏不对人落井下石，真正坚持了做人的底线。我敬佩他！

你在《记忆》152期上关于高云鹏的文字，都是不实之词。究其原因，一是高云鹏事件发生的时间基本在我们离校以后，很多情况不了解；二是由于派性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受到某些误导。我根据个人的经历，对《北京大学纪事》上关于高云鹏的记载早有疑问。近几年来，我通过多方了解查证，才知道了一些真相。但无论怎么说，你在客观上已经给高云鹏造成了伤害。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公开向他道歉。当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对任何传言，任何资料，都要认真对待，要努力去伪存真，不能把什么都当作“信史”。

我和你一样，很赞成清华陆小宝说的：“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

我更赞成文研先生在《王大宾回忆录》序（一）中的一段话：“反思这场文革运动，不只要研究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运动，为何能够发动这场文革运动，还要研究毛泽东怎样审时度势，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运动的，他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大势的掌控，主动进攻，被动应对，策略转换等等。总之，你不把毛泽东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对文革运动的反思，你对文革运动的回忆，往往就容易失实，失之于偏。”

愿我们都能脚踏实地做一些收集、整理、考证、分析的工作，努力为我们的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不妥之处，请指教。■

2016-05-12 定稿

【评论】

答甘仲义

——考证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件史实

辛伯仁

甘仲义先生在《记忆》第152期（2016年3月31日）发表了《甘仲义谈辛伯仁文章中的问题》一文。该文对笔者于《记忆》第147期（2016年1月17日）发表的《也谈北大文革史的一些片断——简评章铎、常风之争》一文中若干北大文革史中的史实进行了正误纠错，笔者深表感谢！由于年代久远及个人掌握资料有限，个体记忆难免有误。只有众多文革亲历者反复交流、核对、考证史实，才能逐渐还原历史原貌，以促进对文革史的研究。下面笔者就甘仲义在文中谈及的若干史实，进行交流、核对、考证。

一、关于陈伯达1967年6月5日针对北大的讲话

针对笔者文中所述：“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讲话（一次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饭厅……）”甘文指正：“事实是：陈伯达讲话只有一次，就是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陈伯达的这个讲话，使北大大乱。《北京大学纪事》和聂元梓的记忆都有误。作者（按：指辛伯仁）引《聂元梓口述自传》相关内容就是7月10日前后陈伯达讲话内容。”

对于甘文所指陈伯达于1967年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在人大大会堂的讲话，笔者与甘仲义记忆吻合，没有分歧。分歧点在于陈伯达有没有于6月5日清晨（天还没亮时），到北大大饭厅对群众讲话？陈在6.5针对北大发表了两次讲话，还是一次？在什么地点？讲了什么？考证清楚这件史实十分重要，因为正是由于陈伯达的6.5讲话造成了北大的大分裂，并引发了北大旷日持久的两派斗争，直至发展到武斗。笔者根据本人的记忆及多件

史料认定：陈伯达在6.5针对北大有两次讲话，而影响最大的恰恰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的讲话。笔者确定这一史实有四条根据：

根据一：在笔者的记忆中，本人于6月5日上午在北大三角地带靠南边的一面墙上，看到刚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陈伯达讲话》，该大字报报导了陈伯达于该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的讲话。其中陈伯达的几句话，对笔者及众多北大学生冲击极大，印象极深。陈伯达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北大是一潭死水”，“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这几句话，陈伯达6.5晚上在人大大会堂并没有说过（有《记忆》公布的资料为证）。6.5晚陈伯达在人大大会堂批评聂元梓，最重的一句话是说聂、孙“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

甘文说，笔者所说陈伯达6.5在北大的讲话实为7月10日，这完全不对。陈伯达7月10日确实在北大大饭厅讲过话，但是所说与6月5日完全不一样，并无笔者上述所引的陈伯达的话。在北大保卫组工作的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蓝绍江对7月10日陈在大饭厅的讲话有详细回忆。¹如果甘仲义指的不是陈伯达7月10日的北大讲话，那么是7月10日前后陈伯达在哪儿讲的？对什么人说的？讲了什么？笔者愿闻其详，请提供证据。

根据二：米鹤都编撰的《九十回眸：聂元梓口述史》中记录了如下一段聂元梓的口述：“北大的派性对立原来不太严重，校文革和支持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基本控制着局面。谁知，1967年6月5日陈伯达来到北大发表了‘6.5’讲话，向我发难。他到得很早，先在大饭厅见了对立面的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大饭厅附近遇见了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说：北大运动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²

笔者于2016年4月21日拜访了聂元梓。聂虽已达95岁高龄，但神志清醒，没有大病，

¹ 见蓝绍江文章《我亲历的北大文革中保卫组和“7·10”事件》，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931期。

² 见该书第272页，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

没有“三高”，每天拄着拐杖散步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笔者见聂时，拿着上面所说的米鹤都那本书，笔者在该书272页陈伯达6.5北大讲话那段下面画了黑杠，询问聂：“是否曾让米鹤都对你进行过采访、录音，讲述你的历史？”聂说：“有过，米鹤都采访过我，还录了音。”笔者指着书上有关陈伯达6.5北大讲话那段文字，问聂：“你讲过这段话吗？有人说，这段话的时间、地点和陈伯达的讲话内容不对。你看看这段话，再仔细回忆一下。”聂用手指着书上那段话，手指边移动边一句一句慢慢念出声音，念了两遍，而后以肯定的语气对我说：“这段话记录得正确，有这件事。那天陈伯达很早就到了北大，是6月5日。他就是这样讲的。”

米鹤都整理的《聂元梓口述史》与美国中文网上的《聂元梓口述自传》中关于陈伯达6.5北大讲话，内容一致，包括细节。笔者认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情景，必须穷追到底。历史的真相，往往就隐含在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中。

根据三：《北京大学纪事》和《聂元梓回忆录》都有与上述相近的记载，但有小的误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纪事》把陈在6月5日一早一晚讲话混到一块儿说了。实际情况是：前一句“夺权”说是晚上在大会堂说的，后一句“死水一潭”说是在北大说的，但不是6.5晚上，而是在清晨。《纪事》在以上短短一小段的记载中出了几个小差错，但陈伯达于6.5到北大对群众讲了话，《纪事》是对的，讲什么“北大是死水一潭”是对的，这印证了笔者对这件史实的考证。

《聂元梓回忆录》（页250-251）写道：陈伯达6月5日“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夺权’。”聂的这段回忆是符合事实的，但她同样把陈伯达在6.5一早一晚讲话混到一块儿说了。没错，以上几句都是6月5日讲的。但是“一潭死水”是清晨讲的，是“向群众讲话说”的，当时是在北大，而不是在人大会堂对红代会代表讲话。“想夺权”这句则是陈伯达晚上在人大会堂讲的。聂元梓的回忆证实了陈伯达在北大批评聂元梓把北大运动搞成“一潭死水”，“执行了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以泰山压顶之势打压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北大怎能不大乱？怎会不分裂打内战？这就是陈伯达要打破“一潭死水”之意。笔者当年在6月5日就已意识到了这点。

根据四：笔者唯恐个人记忆有误，特地向四位校友询问，核对了他们对陈伯达讲话的回忆。有的校友完全忘记了，但有三位校友的记忆与笔者基本一致。特别是索世晖校友，他当年是中文系学生。6.5陈伯达讲话后，北大大分化。“新北大公社”于6月9日出现“66串联会”，打出支持校文革、批评校文革，坚持批左、反对分裂的旗帜，客观上抵制了陈伯达搞垮北大校文革的图谋，当时成为拥有六千师生的北大最大群众组织，稳住了北大的混乱局势。索世晖当时是“66串联会”的第二把手，8月时成为“新北大公社”文攻作战部的主要负责人。后来成为研究党史的学者，并在全国政协任巡视员。据索世晖回忆，陈伯达是6月4日夜到北大讲话，时间上与笔者记忆很接近。索确认讲话地点在北大，这和笔者记忆一致。索并补充说，陈伯达在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这句话之后，还讲了一句“有波浪才好呢”。

根据以上四点，笔者认为，甘仲义对这件史实的指正有误。陈伯达1967年6月5日清晨在北大的讲话太重要了，他的这个讲话对北大文革产生了极其恶劣的重大影响。而北大校友们对陈伯达6.5讲话的记忆，分歧又极大，有的校友朋友曾批评笔者在此件史料上误导了公众。对此我是绝不认同的，并因此不厌其烦地考订此事，与校友们交流。

二、关于1967年1月周恩来指示新北大到高教部夺权

甘文针对笔者文中所述新北大“奉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甘文指正道：“总理在1月18日说‘北大、清华、师大等综合大学，在国家机关夺权中多做些贡献’，没有具体指到高教部夺权。”甘文否认周总理曾指示新北大到高教部夺权。

《聂元梓回忆录》（页207-208）写道：“后来，周总理有个指示，他说，夺权要在

本系统夺权。周总理还说，别的学校到高教部去了，你们北大学生也应该去啊。北大学生就跑到高教部去夺权。”聂元梓的回忆明确指出周总理指示了新北大应去高教部夺权。

甘文没有否认周总理指示“夺权要在本系统夺权”。从逻辑上推测，周总理不可能要新北大去“石油部”、“化工部”或“外交部”去夺权。所谓“本系统”，当然是指“高教部”。周恩来也确实点明了要新北大去高教部夺权。

当时聂元梓指示带领新北大师生和“红旗兵团”去高教部夺权的领队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李士昆二人。2016年4月29日，李士昆在北京向笔者回忆、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他说：“1967年1月，聂元梓找我和赵建文，传达周总理指示：现在文革发展到夺权阶段，北大、清华要起带头作用，按系统夺权，去高教部夺权。聂元梓要我和赵建文带队去高教部。”李士昆是此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的记忆当然很重要。

新北大师生去高教部夺权，不能因为有周恩来的指示，其性质就变成是正确的。其性质仍然是响应、执行了毛泽东进行夺权斗争的极左错误。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无论周恩来在文革中内心是怎么想的，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政治路线方面，他始终是选择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三、关于“除隐患”战斗队向中央上报的材料

甘文指出，笔者以下所述有误：“‘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3月至6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林杰、王、关、戚等人问题的材料。”甘文对此正误道：“此处不确切。除隐患只是整了吴传启及以下人的资料。当时公社总部有指示，林杰的材料都不让整，何况王力。”经笔者核对，甘文对此事的纠错是对的。此外，在研究1967年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与极左派斗争，向中央上报材料这件事上，笔者有个失误，没有把“除隐患”的活动与聂、孙分开考证。“除隐患”战斗队固然是在聂元梓指导下调查、上报极左派的问题材料，但聂、孙本人也在单独进行调查、整

理、上报有关极左派的问题材料。对此，笔者要做如下补充：2016年4月10日笔者访问聂元梓，向她询问，在1967年有没有向中央上报、反映过吴传启以上大人物的问题材料？聂思索了一下，肯定地回答：上报过王力、关锋的材料！再问她：几月上报的？她却回忆不起来了，说：“想不起来了。”

对此，笔者只查到以下资料：1967年3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校文革组织部成员）三人到解放军报找李讷，向李讷着重反映了有关林杰、王力、关锋等人的问题，并递交了高教部夺权纠纷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力、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引自章铎：《我所了解的孙蓬一》，2015年9月15日发表于《记忆》第139期）。这次，聂元梓等三人通过李讷直接向最高领袖上呈了关于王力、关锋的文字材料。此次上交材料之后，紧接着于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求见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之后去钓鱼台见了江、陈，告了王力、关锋的状。孙蓬一在接见时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笔者于2016年5月2日询问当年“除隐患”战斗队成员黄兰女士，是否知道1967年3月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通过李讷上交中央的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是谁写的？是不是赵建文写的？黄兰（赵建文夫人）告知：“不是赵建文写的，可能是徐运朴写的。徐运朴当时代表校文革负责高教部的夺权，当时从高教部夺来的一大堆印章就放在徐运朴那儿。”（注：徐运朴已去世）以上资料证明，从1967年春季始，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斗争方向，已指向了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甘仲义对笔者的纠错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另一角度做重要的补充，以便完整、清晰地再现当年的历史。

四、关于中央公布王力、关锋倒台一事

甘文指出，笔者文中以下说法不确切：“9月1日，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公布了王力、关锋的罪行及其倒台。随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群

众大会，公布了王、关的罪行。陈伯达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小爬虫王力、关锋！’”甘文指出：“1967年9月1日召开的是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中央以王力、关锋不出场会议的方式宣布他们的倒台。此次会议没有提及王力、关锋，更没有公布他们的罪行。10万人大会是1968年3月27日关于杨、余、傅的问题。”甘仲义对笔者的正误是正确的。

笔者认为需要补充的是：江青在9月1日会议上，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关（不仅仅是以王、关不出席会议的方式宣布他们倒台）。江青发言时，不同于以前，多次强调要批极左，反极左。江青说：“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捣乱，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他们‘反总理’，‘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江青这些话是指谁？当时红卫兵的头头们都明白。

韩爱晶后来进一步认识到：1967年9月初，“毛泽东对其文革战略做了调整，让江青出面批极左”¹。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运动失控。“7·20”武汉事件后，在林杰、王、关、戚的煽动下，全国掀起反军狂潮。“7·20”前后，大部分支左部队出现了对抗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倾向。其中，以陈再道的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百万雄狮”及“独立师”，参与扣押中央代表王力、谢富治为最。毛泽东不能丢掉枪杆子搞文革。为了掌握军权，毛抛出了王、关做替罪羊，并暂时批左，以控制局势。毛泽东审时度势，调整了战略。

再次感谢甘仲义先生对笔者文章中若干历史事件的正误纠错，仅挑选出以上四件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史实与甘先生交流、考证，并没有对所有条条交流。甘文对此四件史实的正误，前两件事笔者不认同，并且反正误、反纠错。对后两件事，笔者同意甘文的指正，但做了重要补充。对甘文就其他一些不大重要的史料的正误就不一一深入考订和讨论了。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应首先把史实搞清楚，在准确、完整的史料基础上研究历史，才能总结出应有的经验与教训。而这一工作，需要众多文革亲历者相互交流、核对、补充、挖掘、考证、还原，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笔者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责任。■

2016年5月13日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318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作者许爱晶即韩爱晶。

【书评】

真实的文革画面

——读王复兴《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孙月才

读完王复兴君的电子版《回忆录》，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真实。作者出身北大历史系，该系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史学大师，这对复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回忆录》严守“秉笔直书”这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者以惊人的记忆力将北大的文革画面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燕园大乱，到“8.31”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历史细节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再现，令人如临现场。《回忆录》涉及的重要事件，言必有据，许多北大的文革场景，与其记叙相吻合。真实不仅指客观事件，也有内心的真实。汪篔是历史系第一个自杀的史学家，复兴因参与批斗，而深感“罪过”，“追悔不已”。

面对王家三代的文革遭遇，复兴坦呈自己的情感波澜，尤其是对父亲“右派”问题的矛盾心理，对祖父和两个弟弟苦难经历的悲愤，多少年后，读者也会为之动容。文革中，家庭被政治伤害得千疮百孔，王家的命运是文革中千家万户的一个缩影，其特殊性在于，这里面有着厚重的爱国家史。其祖父早在西安事变前夕即与张学良商略“兵谏”事是有史料价值的。后来祖父、父亲在海外又为国共合作做了贡献，作者七岁时和家人一起回到祖国，但在文革中，这都成了复兴的“历史污点”。文革中的家庭遭遇，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回忆录》提供的史料殊为可贵。

研究历史重在理解历史的意义，其前提是事件的真实性，而“魔鬼在细节之中”。《回忆录》重视细节。大事件的重要性都是从细节的真实中体现出来的。细节中透露出人性的善恶美丑，更易为后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回忆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有思想性。作者在叙述一些历史事件后，往往对这些事件作一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析评论。这些反思对

文革研究是有启发的。这里谈一点我读了以后的一些心得。

第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分析是，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阴谋”呢，还是有其客观必然性？作者除了调查大字报当事人的亲历外，还根据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和北大的实际动向，断言产生第一张大字报的决定因素，其一是中共中央关于清洗党内走资派的“五一六通知”，其二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际饭店”会议）中，反陆平一派的党员受到打击压制。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大字报由聂元梓领衔是偶然的，在北大出现这样一张大字报则是必然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阴谋论”。澄清大字报的来龙去脉是必要的，大字报对上至毛泽东，下至千百万群众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我还可以说文革后对聂元梓的判“罪”最真实的原因是这张大字报，只是不好明说而已。有些人总是喜欢对历史的真相按主观的政治意图任意涂抹，对历史的当事人，或捧到天上或彻底地妖魔化。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致命缺陷，大字报的“阴谋论”仅一例而已。

其次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及其遇害。《出身论》挑战特权，提倡民主、人权、人人平等，作者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判为死刑。从《出身论》的思想到作者的惨死，复兴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个脱离官僚话语系统和目标的“人民文革”。“人民文革”的思想与“中央文革”是对立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悲惨结局，但也注定了“中央文革”的失败。“人民文革”这个词儿我还是第一次读到，这是一个极有创造性的概念，它深刻的理论内涵，以及它与“中央文革”的对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话题，值得文革史研究者重视的。乱世有各种思潮的碰撞，它是可以出思想家的。但文革“雷同毁异”，“世不容哲”，没有个体自由。只能出现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惨剧，和王若望因反极左思潮而被迫出走。

第三，是反左反右之争。左右之争几乎贯穿文革全过程。从中央到基层，尤其是北京、北大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复兴对这个过程和斗争的实质作了分析，主要集中在1967年的北京和北大。他认为1967年在北京、北大两种思潮斗争中，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其实质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中的“走资派”，它脱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

的一个亮点。它属于“人民文革”范畴。

我认为复兴的论述符合史实，其论点也是对的。想补充一点的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也包括北大“井冈山”的一部分负责人和群众，而新北大公社也并不是全体都自觉认识到反极左思潮的重要性及其实质。我由此也想到老师们反中央文革的所谓“二月逆流”。我们当时还附和着反“二月逆流”，那是因为对中央文革的本质还缺乏认识，但在思潮上和老师们一致的，都反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也许我们和老师们追求的具体目标有所差异，却都可汇入“人民文革”这一潮流。事实上，“人民文革”最终在文革中是受“中央文革”迫害的。文革以后，老师们得到公正的对待，对待红卫兵却是极其不公正的。红卫兵中违法分子理应受到惩处，但对其整体应该认真研究，不应妖魔化。

复兴在《回忆录》中已说到，北大校园内的众多文物经过文革毫发无损，这是因为两派达成协议，不准损坏任何文物！再看冯友兰先生的记载——红卫兵在冯家发现一张印有卍的花边纸，问为什么印上“纳粹标志”？冯先生解释，纳粹的标志是卐，与起源印度表示吉祥之意的卍毫无关系，红卫兵表示信服。冯先生说，他“很感谢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还容我解释，而且还相信我的解释，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¹。我再引一段李泽厚先生有关红卫兵的论述：“二十年前忠实履行‘斗私批修’，‘下乡上山’，以及在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自杀决不投降的那些纯洁、无私、勇敢、禁欲主义地献身革命的红卫兵们，尽管文化大革命以喜剧式的‘四人帮’被捕收场，留下来的是惨痛伤痕和平均化了的贫困，但这些年轻生命的意义，难道就以‘愚昧无知，上当受骗’而因此一笔勾销。”²哲学家的明达和勇气，让李泽厚先生公开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政治家中大概除了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外，谁也没有为红卫兵说一句公道话！红卫兵是真诚的，是盲目的，是勇敢的，也是可怜的。一切都源于那个时代始终没有确立起独立的个体。

历史的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红卫兵运动必须彻底否定，但“彻底否定”并

¹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第173页。

² 李泽厚：《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第113页。

不是把红卫兵妖魔化。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红卫兵是有理想的一群青年人，这种“理想性”有其真诚，感人的一面，这些并不会因为文革失败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盲从毛泽东而失色。理想有着某种穿透力，是不会毁灭的。震撼世界的中国红卫兵运动启示是一部血泪史，它以悲剧告结，但青年人的真诚、追求依然是有其生命力。

最后是对聂元梓的判决问题。《回忆录》以事实和逻辑驳斥了法院“判决书”。断言聂案是一个“冤案”，是一个重创了法律的政治判决。对此，我深有同感。2014年中秋我见到聂时说：你别再奔波了，历史会还你真相的。她临时挥笔赠我一幅字：“道通为一”。

对聂的判决真的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了吗？仅举一例，“判决书”指控聂的一条重要罪状是，邓朴方致残系聂指使他人对邓“严刑拷打”所致，时间是1968年4月7日。复兴说，邓的受伤致残时间是1968年8月31日，其时学校已由工军宣队主政，致残原因是邓在顺外墙水管下来时水管断裂所致。我以为，在关于邓受伤致残的种种说法中，复兴提供的是最可靠的“版本”。在邓受伤后没几天，物理系的一个同学（与邓同系）曾在一个教室内对我说起邓受伤的经过，与复兴说的完全一致。这个同学时穿白底浅格子夏装，由于天热，讲述时脸上还冒汗。这件事我曾在2015年7月20日给胡宗式的信中讲过，只是时间误写成1967年了。但事发在夏天则是确切无疑的。“判决书”说是4月，但北京的4月还可穿毛衣，怎会穿短袖夏装，更不会冒汗。那个同学告诉我，邓受伤后，住院由其妹邓楠陪护。邓朴方，邓楠都还健在，他们都是诚实的人，法庭为什么不向他们求证？我的《文革十年日记》出版前，在提到邓朴方是校文革成员时，本想对他的致残原因做个说明，考虑到邓的艰难处境，我回避了。在这里，我为复兴的“版本”提供一点佐证。

另外，复兴还驳斥了“判决书”说文革初期聂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革初，怎么会有什么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呢？人们只知道他们都是中央领导人。这样罔顾事实，不讲逻辑的判决，能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吗？进而言之，对首都高校的所谓“五大领袖”的处理、判决都合理合法吗？贫乏的法律素养，薄弱的法制意识，让这些判决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如果说，这种判决还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将政治大

于法律摆到了桌面上，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重量级的负面案例。

《回忆录》且叙且议，作者长于理论分析，反思时有亮点，有的看法是很“异端”的。诚如马云龙“序”所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要允许他“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革蔑视人的尊严，是人性的悲剧。然悲剧可以陶冶人，是对人的精神上的去芜存精的淬炼，受苦难而超越苦难，从而达到民族的、个人的精神上的提升。文革后，经历过“烈火”而头脑仍然清醒的人，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守理想而继续奋斗者，他们是民族的精华，中国的脊梁。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革已有《决议》了，无须再化力气研究。这种观点是短视的。是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它既未还历史以真相，更没有深究其原因。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没有人不断地提供新的史料，不断地提供新的思考，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重要的是吸取教训。否则即使身受文革之害的人，气候一到，又会重演文革。

曾几何时，被称为“小文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发生在1983年，“反对自由化”运动发生在1987年。想当初，发动这两个运动的“义正词严”，决不亚于文革初期的“社论”。如果广大知识分子忘了文革的教训，完全可以再被鼓起“革命热情”，投入到这祸国殃民的运动中去。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们用行动抵制了这些运动，使更多的人避免受到伤害。

以文革研究为禁忌的人也许为了稳定。人民总是希望过太平日子的，知识分子只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要讲稳定，首先是上层的稳定。从文革到“清污”到“反自由化”，无不都是由上而下鼓动起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良知的，是会明辨是非的。有一篇讨论文革的文章，涉及道路、理论、制度问题，不乏精辟之见。但说文革失败，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轰然倒塌”，似有夸张。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对于资本的分析都是极为有力的，其以人本为核心的价值观今天依然有着极大的生命力。过去漠视了这一价值观，教训惨痛。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辩论，应该说我们更接近马克思了，因此时时有“回到马克思”的呼声。

还有一部境外出版的有关北大“牛棚”的回忆录，其“导读”说，毛泽东的文革所为，远非希特勒辈“所能望其项背”。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是过分了。这种看法，不但使这篇本来还写得不错的“导读”大大减色，而且也对这部相当优秀的回忆录产生了负面影响。

毛泽东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对他所犯的严重错误，应该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做充分的分析和思考。在这方面，国外严肃的学者所做的毛泽东研究是很认真的。毛最大错误是关于文革的理论、路线的错误。其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复杂的，这值得认真研究。诚如复兴君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这背后何尝没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子。文革的后果远非毛所能预料，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毛反对官僚体制是为了追求平等，但他没有解决好个体自由、个体权利、个体尊严的问题。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他不知道，个体自由受到压制的所谓平等，充其量也只是精神普遍贫困化的平等。这怎么可能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呢？毛泽东至死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他的惨痛教训是人们反思历史、反思文化的一笔精神财富。一个俄国寓言说，鹰有时会飞得比鸡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样高。

文革之于中国的执政者，应该如《圣经》中说的使徒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保罗再三祈求上帝拔掉这根刺，免得继续受折磨，但上帝出于对保罗的爱护没有同意，他要让这根刺时刻提醒保罗知道自己的弱点、局限，鞭策自己不断进取。现在，人民就是上帝。

早在北大我就与复兴相识。他是一个诚挚的人，一个理智而温和的谦谦君子。我们现在在远隔重洋，近半个世纪未见一面，但当年的王复兴还历历在目。我在《回忆录》中读出的仍然是这样一个王复兴，只是他阅历更丰富了，更有思想了，身在异邦写《回忆录》表明了他对祖国的拳拳之心，令我相信，王家的爱国之情将代代相传。■

2016年5月30日于上海

文革五十周年祭

【述 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红梅战斗队与红旗兵团

王复兴

1. 自己解放自己，成立自己的组织

9月初，我们班的徐森、王渊涛、俞政、张文虎和我，五个人很谈得来。我们都不是红卫兵，出身好的只有王渊涛（下中农出身），其他四人都是“职员”出身。我的家庭问题最大，属于“黑五类”，但他们几人都反感血统论。当时我们议论，张某他们能组织红卫兵，难道他们有特权？我们就不行？中央文件“十六条”已经给了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学校不是已出现了许多自己组织的战斗队吗？徐森首先提议五个人组成一个红卫兵战斗队，大家马上赞同，一致推举徐森做队长。徐森和我都很喜欢毛泽东的一首诗词《咏梅》，喜欢梅花越是严寒越怒放的性格，于是战斗队起名“红梅”。徐森去海淀买红布做了五个红袖章，我们每人套到左臂上，战斗队就这样成立了。我们自己也没料到，“红梅”战斗队后来在北大校园里会声名赫赫，影响力很大。“红梅”成立后，我有种解放感，心情畅快。我当时想，《国际歌》说的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红梅”成立后，第一张大字报是《我们的革命纲领》，贴到小饭厅东墙醒目位置。回忆内容有：打倒陆平黑帮；继续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新生革命政权；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打击走资派等等，是几条口号式的声明。后来这张大字报被收编在校文革出的《大字报选》里。

“红梅”战斗队的成立，有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反血统论“对联”，认为那是左倾

错误。当时我们还共同学习了毛选注释里所载 1945 年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起讨论、批判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如其“关门主义”等等。

大约在 9 月底，技术物理系有人找我们开串联会，我代表“红梅”去参加。会议上有几十个战斗队代表出席，都是相同观点。会上有人提议成立跨系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大家同意，于是成立了“新北大红旗兵团红卫兵”，一律配戴印着“红旗”二字的袖章。各战斗队做了登记，“红旗兵团”总部有五人：王金玉（技物系）、刘冲（经济系）、李长啸（经济系）、任瑚琏（中文系）、史新国（哲学系）。

2. 反校文革派出场，开始分裂

10 月 6 日，物理系路远、周闯贴出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大字报批判聂元梓主张斗黑帮要文斗，不要戴高帽、不要搞喷气式，是“温斗”。批判聂元梓不同意成立红五类子弟协会而“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同学”，不满聂元梓不搞血统论。他们的目标是北大必须再次“乱”，追求的是个“乱”。

同一天，经济系杨勋也贴出大字报，批判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路线”。杨勋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们站在“左”的、“激进”的立场，指责聂元梓、校文革是“右”，是“保守”。

随后有许多大字报响应路远、周闯及杨勋。历史系“主义兵”也亮明了反校文革、反聂立场，他们认为聂元梓不够左。同时，出现了许多反击反校文革、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派大字报认为，主攻方向是李雪峰、张承先的工作组错误路线，而不是反陆平、反工作组的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聂元梓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梅”也是持这种观点，贴了支持校文革的大字报。

3. “红梅”扩大，外出串联

当时历史系“红梅”五人商量，应跨系横向扩大战斗队。于是徐森找了化学系一年级、原北京十三中校友陈双基，我找了中文系二年级，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校友马西沙。他们俩人观点与“红梅”一致，一拍即合，加入了“红梅”和“红旗兵团”。我们世界史班的两个女生杨桂香、钱凤娟也时常来“红梅”坐坐，有时帮忙抄大字报，有时跟着参加活动。但“红梅”开会她们一般不参加，二人算是“红梅”的准成员。

10月中，“红梅”开会，决定出去串联。我再也不会去理会历史系“主义兵”对我的禁令。陈双基表示要和我们历史系五人一起外出串联，我当时特地到38楼顶层的历史系文革办公室，找胡德平给我们六人开了外出串联的介绍信，以便在外地大、中学校住宿用。

（后来“主义兵”的张某知道我出去串联了，还去质问胡德平，为什么给我开介绍信，放跑了）徐森主张外出串联就是游山玩水，我主张顺便考察各地文革，但不介入当地运动。另四人主张两点结合，于是取得共识，登上免费火车出发。路上六人轮流掏饭钱，一路南行，先后去了武汉、长沙、韶山、贵阳、重庆。在武汉去过武汉大学，在长沙参观过毛泽东曾主持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展览馆，去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给我的印象，毛泽东故居像是富农家庭。到贵阳时住在贵州大学，我发现钱包在长沙时丢了，于是去找在贵阳大学任教的三姑，她给了我30元（那时够我两个月饭钱）。三姑让我给他们教研室介绍北京的文革情况，于是我应邀讲了一个小时。我们曾去过《贵州日报》访问，由贵阳去重庆。路过遵义时，大家本想去参观遵义会议展馆，无奈人太多，怕下了火车就甭想再挤上来，于是做罢。在重庆住在重庆大学，曾与重庆大学学生座谈，了解文革情况。去过重庆作家协会访问。在重庆大学时，看到了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的油印材料，有刘少奇、邓小平的检查，有陈伯达关于文革运动的讲话。陈伯达的讲话对“血统论”做了尖锐批判，指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世袭血统论，是走资派分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诡计。当时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较多。我觉得这是中央文革大力支持造反派，批评第一代“老兵”、“主义兵”的明显表示，认为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十分深刻，令人振奋。

这篇讲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从重庆回北京，火车站上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人潮汹涌，有许多学生从窗户爬进车厢，于是我也率先从窗户爬进车厢，然后把另外五人一个个拉进来。“红梅”六人很不容易地挤进了火车，但谁也没抢到座位，抬头一看，行李架上也躺满了人。车厢内人贴人，就这样，我们站立式“坐”了五天火车。火车开得极慢，时走时停。一路上我们只有一包饼干和两条榨菜充饥，处于半绝食状态。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北京。

4. 回到北大，投入战斗

11月中旬回到北大。此时，聂元梓、孙蓬一已带领“红旗兵团”一批人，由经济系刘冲领队，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之名，到上海造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当时，反校文革的一派出现了两个组织：“井冈山”、“红联军”。“红梅”一回校就贴出多幅大标语：“坚决支持聂元梓到上海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聂元梓到上海造资反路线反，大方向完全正确！”

刚回到学校时，听“红旗兵团”办公室人员告知：在11月12日下午，“井”、“红”因不同意《新北大》校刊的观点，派了二十来个人把校刊编辑部给砸了。他们关押了办公人员，切断了电话，撕碎了书刊，抢走了公章。我们听了很气愤，相互议论：这不是土匪行为吗？校刊代表了大多数师生的声音，你不同意就砸，还管这种野蛮行为叫“造反有理”，简直荒唐。“红梅”贴出大字报痛斥这种打砸抢行为是大方向完全错误，并四处张贴大、小标语：“新北大校刊的大方向就是正确！”“坚决支持新北大校刊！”校文革把校刊被砸事件上报给了中央，中央文革定其为“反革命事件”。

那时“红梅”天天贴大字报、大标语，有时一晚贴出五六份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支持聂元梓在上海造反的，有批判血统论的，有批判陆平黑帮的，有反击炮打中央文革“黑风”的，有反击北大“红联军”、“井冈山”对校文革、聂元梓进行攻击的，有批判“怀

疑一切，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由于抄大字报任务太繁重，兵团总部派了物理系三年级三位女生杨百瑞、王育南、王辑慈，每天来帮助我们抄大字报。那时“红梅”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影响很大。有许多人看战斗队的名字，以为“红梅”是由女生组成，以为人数众多，其实就是七名男生。“红旗兵团”开会时，中文系的黄虹坚戏称历史系“红梅”的五个人是五朵梅花。

当时，北大学生支持校文革、反对“井冈山”、“红联军”。除了“红旗兵团”，还有以化学系为主的“北京公社”（头头是陈醒迈），以历史系三年级“延安”战斗队为骨干的“东风兵团”（头头是靳凤毅、李炳煌）。

一天，化学系北京公社的“0363”战斗队召集几个战斗队开串联会，齐菊生主持，商议批判血统论“对联”事，我去参加了。会上决定共同贴一批大字报把“对联”批倒，批臭，批驳谭力夫的谬论。第二天，“红梅”俞政写了一长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抄好大字报后，贴在了大饭厅南墙上。当时几个战斗队共同行动，贴出多份大字报，形成一次批判血统论及谭力夫的高潮。

在“红旗兵团”一次内部串联会上，我认识了中文系“东方红”战斗队的队长索世晖。索世晖分析形势，认为现在从校外到校内有一股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北大反对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势力，其目的是推翻刚刚建立的新生的红色政权，破坏新秩序，实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他的分析与我不谋而合，从此建立了两个战斗队及两人的长久友谊。

11月19日，索世晖的“东方红”战斗队贴出一份大字报《夺权与反夺权 复辟与反复辟》。近年我很幸运能在一份材料中找到这份大字报的摘录，其主要内容很能反映出当时我们的观点。该大字报指出：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把矛头指向‘黑帮’，而不是对准同学”，“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路线正确”，“校文革是新生事物，是我们群众自己的组织”，“井”、“红”说“校文革是由中间力量把持”，“陆平黑帮的社会基础还没有破除”，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并指出“许多同学要求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实际是

形左实右在我校的反映，聂元梓坚决抵制了这条反动路线”，“要把群众和幕后指挥者严格区分开来，我们怀疑有人在暗中破坏”。大字报最后指出：“和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99%是革命同学。”

11月至12月，“红旗兵团”总部任命徐森为动态组组长，负责出版供兵团内部参考的油印《动态报》。12月的一天，徐森应地院“东方红公社”之邀，代表“红旗兵团”去地院开串联会。回来后，徐森传达了地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对形势的分析。朱认为，经过9月至12月以来左、右两派的斗争，左派（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中间派群众在向左派靠拢，右派（保皇派）在逐渐瓦解，造反派正在由少数成为多数，成为运动主流（大意）。我们讨论时，认为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看法符合北大实际。到12月时，“红旗兵团”迅速壮大，已在北大成为主流，真正的造反派已掌控了局面，反校文革势力已日渐式微。

11月时，“红旗兵团”总部决定成立直属总部的写作班子。“红梅”由我代表参加，另有数力系四年级的谢定国（笔名扬子浪），中一的黄虹坚，哲五的甘斗，经济系的金崇顺（参加过志愿军抗美援朝）、胡宏宽，物三的徐云辉。写作组同时是个战斗队，取名“横扫千军”。写作组成立后，扬子浪、甘斗二人写的文章较多，用大字报以“横扫千军”名义贴出。我当时负责编写“北大文革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曾找“红旗兵团”哲学系教师郭罗基拿资料，郭积极配合了我。在12月底，“大事记”用大字报以“横扫千军”名义贴出。

12月初，农大附中伊林、滌西在北大贴出攻击林彪的大字报，“横扫千军”、“红梅”同时贴出大字报反击。有人在北大转抄、贴出林院李洪山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横扫千军”、“红梅”同时贴出大字报反击。

“横扫千军”、“红梅”、“东方红”还贴出过多份批驳“井冈山”的“红老虎”、牛辉林（个人）反校文革、反聂元梓的大字报。记得12月时，我曾贴了一篇批评牛辉林的大字报，题目是《乌鸦有时飞得也会比鹰高》。当时到外地串连的北大学生正大批返校，大批同学加入“红旗兵团”。以上三支战斗队影响很大。在11月、12月，“红旗兵团”

有一批有影响的战斗队，除上面提到的三个，还有历史系的“红色清道夫”、“桔子洲”，中文系的“文二四支队”，哲学系的“顶风船”等等。反校文革派逐渐孤立、瓦解。

“东风兵团”的“延安战斗队”（历史系靳枫毅、李炳煌两人是头儿），当时连续贴出了多份批判刘少奇的长篇大字报，包括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很有影响。

5. 享受自由，广结友谊

11月、12月，我在“红旗兵团”内有着广泛的交往。我们“红梅”的七个人，我、徐森、张文虎、俞政、王渊涛、马西沙、陈双基，在战斗中结成“莫逆之交”。“红梅”的马西沙（中二）与我从小是同学，小学住校时是常常一起晚上尿床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曾多次对我说过，他积极投入文革，成为造反派，是突破了自己的社会局限。他父亲马旭是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在文革中作为“走资派”遭到批斗。北医多次举行批斗马旭的万人大会，马西沙都会去参加，并照顾老爸。一次批斗大会开完后，他父亲马旭已走不动路，是他背着父亲回的家。红梅的陈双基（化一）思想很活跃，看问题常一针见血，我们相处极为愉快。“横扫千军”的几个人，特别是秀才扬子浪、性格泼辣开朗的黄虹坚、兵油子老金（金崇顺），经济系才子胡宏宽，也是朝夕相处、观点一致，十分对脾气。另外，中二的任瑚琏，经济系的李长啸，哲学系的史新国、吴丽珍（红旗兵团办公室接待员），历史系四年级考古专业的刘庆柱、张绍清、彭浩（此三人是“红色清道夫”战斗队骨干，在北大文革中极有影响力）等人都经常交流，相处融洽。当时我与“红旗兵团”中在北大文革中较有影响的人也有交往，如“红旗兵团”头头之一刘冲、哲学系研究生孙月才等。校文革、聂元梓、“红旗兵团”从未主张过血统论，人们相交看重的是立场、观点、表现、行为。当时，我与周围的关系已完全打破了班、级、科、系的界限，已完全抛掉了家庭包袱，感到有了人的尊严，心情舒畅，精力旺盛。

毛泽东当时打破了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禁区，给了人民短暂的“言论自由”、“结社自

由”，以此达到他利用人民的目的。但这些短暂的自由在他达到目的之后，便很快于1968年8月以后收回去了。在那享受民主、自由的短暂时段，人们普遍有种解放感。正如扬子浪对我所说，他不喜欢从前刘少奇的“修养论”，不喜欢当听话的“螺丝钉”，不喜欢天天政治学习、汇报思想那一套，讨厌领导用档案管治人，更无法忍受“出身歧视”，那是束缚人性！现在这样自由奔放多好，我深有同感。但好景不长。此外，北大那段历史还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没有法制保障的条件下，大民主会产生极大的负作用、破坏力。

文革发展到12月底时，“红旗兵团”的中坚力量，我上面提及的绝大多数朋友，包括我本人，大家经常交流观点，对警惕极左思潮有了共识。那是一个群体性的集体认识。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以下明确的看法：北大已经历了推翻陆平党委、赶走工作组这两波夺权浪潮，而校文革是新生的革命政权，是新生事物。由于文革运动在全国发展的不平衡，北大走在最前端，而全市、全国各地许多地方还处于冲击旧党委、批判工作组的浪潮中。那种无视北大特殊性，在形式上、表面上要与全国各地的造反浪潮看齐、相呼应，在北大不断造反，不断夺权，掀起第三波夺权浪潮，是一种形而上的错误思想方法，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它否认正常秩序，阻碍建立新的秩序。对他们而言，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追求的社会效果是乱、乱、乱，反对相对稳定。这是种对社会的破坏力量，必须予之坚决斗争。我们当时的认识虽有历史的局限性，还认识不到法制的重要性，也不可能跳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认识不到前两波造反浪潮（反党委、反工作组）已经是左的错误，但在1966年底已明确认识到：必须转弯，反对极左，而不是反右；必须反对激进主义，而不是打倒一切。在认识上有了一种相对性的进步。

6. 1966年底，北大两派斗争结局

1966年第四季度，北大两派斗争，即：一派是支持校文革的“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等组织；另一派是反校文革的“井冈山”、“红联军”、

“主义兵”等。到12月底，绝大多数师生已倒向校文革、“红旗兵团”。“井”、“红”日渐孤立、式微。12月23日，校文革根据周总理、康生的指示，把经济系的教师杨勋（据说她当时反中央文革，也是最初反聂元梓的发动者）扭送公安部关押。同一天，“红旗兵团”、“东风兵团”、“北京公社”查封了“井”、“红”办公室。反校文革一派开始崩溃、解散。

据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她和孙蓬一“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上海，十二月十六日回到北京”（《聂元梓回忆录》，第192页，第十章第三节“上海纪行”）。实际上，孙蓬一回京稍晚些。北大第一次分裂是从1966年10月6日开始，至1967年2月15日以“新北大公社”正式成立为标志结束了分裂局面。聂、孙二人在“井”、“红”开始反校文革的初期阶段及其后期的瓦解、垮台阶段都在北大。

1966年第四季度北大两派斗争，属于师生内部的思想分歧与争论，说到底为人民内部矛盾。校文革、“红旗兵团”等是站在拥护文化革命的左的立场，而“井”、“红”、樊立群、牛辉林等是站在更左的极左立场，从极左方面反对左的校文革。两派都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都反对刘邓司令部，这是共同点。对部分师生的极左错误思想本应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其觉悟，双方应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但这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在当时阶级斗争观念泛化的状态下，相互之间斗红了眼，可谓脱离实际，很难实行。当时北大两派群众都深受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的影响，视不同意见的对立组织为敌对力量、错误路线。“井”、“红”要打倒校文革，摧毁“红旗兵团”。校文革、“红旗兵团”等组织则要摧垮、吃掉“井”、“红”。

1966年12月至1967年2月，“井”、“红”、“主义兵”垮台、解散。当时校文革除了炮打中央文革、炮打林彪的“虎山行”、乔兼武之外（他们被指为“反动”并非因反聂）并没有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也没有把对立面的学生打成“反革命”，那些说法都夸大其词，不符事实。当然，他们被以言治罪而被关押也是错误的，违背法制。在当时“大民主”的环境下，各系、各年级、各班的主流派师生（“红旗兵团”、“北京

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等已占大多数，他们在各系各自对“井”、“红”成员进行了辩论、批评，甚至批判，批评他们犯了“方向错误”“分裂错误”“干扰斗争大方向”“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等等。如此而已，一般没给他们戴什么反动分子的帽子，更没入“档案”。那时“档案”管理已停了。

“井”、“红”日益被动，失去人心，最终瓦解，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1）当时聂元梓、校文革是反陆平党委、反工作组的产物，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支持。“井”、“红”硬是要把聂元梓、校文革打成刘邓资反路线，自然会脱离当时的大形势，无法成功。（2）聂元梓、校文革是左的，“井”、“红”偏要说他们是右，是资反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因此是站在更左的方面反左，北大师生很难接受。（3）“井”、“红”砸“新北大”校刊，搞打、砸、抢，李讷和中央文革人员看了被砸现场，中央文革定其为反革命事件，这使“井”、“红”十分被动，并大失人心。（4）周恩来、康生指示聂元梓将经济系教师杨勋押送公安部，此案是冤案。但由于“井”、“红”与杨勋同属反校文革阵营，因此杨勋被关押使反校文革派十分被动。（5）解放军军训团进校，支持“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在军训团主导下，四个群众组织合并，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至此，“井”、“红”已无法再存在下去。

校文革在处理“井”、“红”问题时，也有不当之处。当时各系、各年级、各班自行其是，在批评“井”、“红”师生时有过火现象，校文革没能及时给予群众严格的政策指引，留下了后遗症。历史系二年级世界史班就把“主义兵”的头头赵惠生批得灰溜溜的。赵与我个人关系不错，曾向我报怨班里对他搞大批判。我们“红梅”则给历史系一年级“主义兵”的头头张某贴了一张大字报。事后，魏杞文老师批评我不应这样对待同班同学。孙蓬一在工军宣队进校之后的书面检查《切实记取教训》中，写道：“而我们在处理‘井’、‘红’问题时却存在不少错误。尽管聂元梓同志也讲过几次，反中央文革的才能批判，反她和反校文革的不能追究，但总未认真贯彻、执行。结果严重扩大了打击面，据说批斗了二百人。”

7. 对乔兼武事件的反思

乔兼武事件,是指北大东语系学生乔兼武于1966年12月19日凌晨二点半左右被公安部押走的事件。乔兼武曾于1966年8月30日在校内贴出《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其中中心思想是要彻底摧毁一切上层建筑。所造的三个大反是: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认为“党团组织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第二是“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反对党、政分离。第三是“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认为“我们应该立即动手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以群众组织代替一切。我始终认为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其性质是反社会、反文明的愚昧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所造的第三个大反,要取消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所有办公机构,那岂不是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片荒漠,倒退回石器时代?这种“造反”毫无进步性可言。乔的言论,当时遭到许多师生的批判。但《新北大》校刊仍称他为“同志”,只视其为发表错误言论的人。11月15日,北农大附中的伊林、淩西在北大贴出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攻击林彪,乔兼武表示支持。“红旗兵团”等群众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对伊林、淩西、乔兼武进行批判。当时乔仍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12月18日,乔兼武写了一份大字报底稿《谈致林彪公开信的大字报》,再次力挺伊林、淩西,攻击林彪。这份大字报尚未贴出,被东语系同学举报。当时正值全北京反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反击“联动”)十二月黑风的高潮,校文革、“红旗兵团”决定把乔押送公安部。校文革与公安部联系,公安部负责人答复:“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公安部马上来人扣押乔兼武。”晚上,校广播电台广播了将把乔兼武扭送公安部关押的消息,并宣读了“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的联合《通告》。19日凌晨二时半左右,乔兼武被公安部带走,不久释放。扬子浪在他发表的《文革

日记》¹中的“12月19日”记录了此事：“18日晚7时兵团（按：指‘红旗兵团’）伏虎团将他扣押，19日凌晨2点半扭送公安部。”

当时校文革、“红旗兵团”处理此事，就错在封闭他的言论——我们可以不同意并批评乔兼武的观点，但不可以更不能侵犯他的人权。错误的根源是由于两派群众深受毛泽东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把北大校园内当年的思想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并认为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支持校文革的一派认为，乔兼武从无政府主义发展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必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斗争。

一天我看“红旗兵团”动态报，报导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李平忠（我原北京水上运动队队友、跳水运动员，当时是体院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群众组织“四野”的成员）抢占学校广播站，发表反江青声明，而后被公安部关押。不久，听说在中央党校青训班的四中同班校友宋扬之，因反康生被公安部关押。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有一百多名中学“联动”成员被公安部关押。当时由谢富治掌管的公安部动用专政机关，以专政手段介入群众运动、介入政治斗争，支持中央文革，以言治罪，频繁地抓捕、关押了大批大、中学生。被关押的学生绝大多数并未判刑，少则关几天、多则关几个月，便被释放。那作用是：把你关几天，你就老实了。谢富治的这种做法纯粹是种政治打压手段，目的是支持中央文革，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公安部作为高级执法机关，滥用国家机器，用专政手段处理言论自由，践踏法制，影响恶劣而深远。据《王力反思录》披露，对“联动”的抓与放，都是毛泽东的决定。■

¹ 扬子浪：《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刊于《记忆》132期2015年6月15日。

【文摘】

北京大学的“四清”试点

杨 勋

1963年从农村搞起的“四清”，1964年延伸到了大学。北大被当作全国高等学校的“四清”试点，要先行一步。就在这年的冬天，来自全国的二百多名高级宣传文教官员齐集北大校园，开始了“四清”大会战，正式名义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的社教工作队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副队长有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

社教工作队进驻北大后，北大的政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由于工作队员都是大干部，又是运动试点单位，他们的活动声势很大。工作队布置运动一般都在办公楼召开干部会，这种会我都参加。记得有一次大会从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张磐石同志分析运动形势和布置工作，声调严肃，布置周密，给人的感觉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下令攻打冬宫一样。根据张磐石的布置，在那天全校揭发问题已达到高潮，应当立即转入夺权阶段。

经济系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单位。派来的工作组阵容强大，共有七人，为首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叶方，¹成员有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陆维特、²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蔡复生³等，联络员有中宣部的阮铭、北京市委大学部的李开鼎等。他们不仅资格老、职务高，而且一副派头很大的样子。这些高级干部开会时不像教师们那样随便，他们端坐在会议桌两旁，散发着一一种说不清的威严气氛。他们当时大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开会时，桌前同时摆放着几副明晃晃、金闪闪的高级眼镜，而且都以很权威的口气讲话，那架势使从未出过校门的“三门干部”们大开眼界。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也许是一批包青天式的大人物，真要在北大大战一场，北大真要新生了。

由于有了反右倾的挫折和锻炼，我也能发现学校和系的不少问题。党员干部们一般都

¹ 疑为副部长——本刊注。

² 陆维特做过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1955年调任是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没当过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本刊注。

³ 网上没查到此人——本刊注。

出身不好，胆子小，没有自己的政治头脑，上边布置什么就紧跟照办。“三年困难”那几年由于吃不上饭，人们情绪低落，系里、班里出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除了1959级学生那种政治问题外，还有不少生活作风、道德品质问题，如偷盗和男女关系等。相比之下，我倒是显得干净纯洁，只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政治是非，于是更加强了自信心。从情感上，我是一向厌恶那些男盗女娼粗俗勾当的，所以觉得能借这次“四清”运动把这些问题清一清也很有必要。抱着这种态度，我积极地参加了学校和系的“四清”，主动靠近工作队，积极反映情况，成了名副其实的社教积极分子，不顾正在吃奶的孩子，不管家，又去闹革命了。

“四清”运动中很讲阶级成分和出身历史，出身好的人明显得势。在经济系我和严庆珍比较亲近。严的父亲也是抗日时期的八路军干部，她本人解放后参加工作，后来由工农速成中学而上大学。我和她同龄，经历接近，很谈得来。“四清”开始后，我和严都是积极分子，一起去拜访工作组的同志，特别是对老资格的蔡复生，从心眼里信任佩服。我们把工作队的人当作前辈叔叔伯伯相待，幻想工作队能让北大回到人民手中，实际上接受了“北大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提法。

工作队进校后积极组织阶级队伍，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把揭发出的问题“梳辫子”归类上纲，很快就将矛盾升级了。如经济系揭发的问题有：政经教师鲁达曾攻击刘少奇因在七大时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而上台，有的党员干部变成小偷，有的学生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有人因恋爱持刀行凶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系总支领导软弱无力，界限不清，甚至对犯错误的人纵容包庇，因为那些出问题的人一般原来都是领导的红人。假如他们不是红人，他们就不敢那样猖狂大胆地做坏事。

以上这些问题，中层干部早有了解，但并未把它当成严重问题。工作队进校后，很快就把这些当阶级斗争动向狠抓不放，而且把问题整理归类，梳成了“六条辫子”，最后把北大说成是“资产阶级大染缸”、“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等等。于是，号召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推广桃园经验起来夺权，就是夺原来领导

班子的权。这样，矛盾激化了，队伍很快分化了。系总支书记龚理嘉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再满脸堆笑地配合工作队了。有的干部一看总支不行了，就更积极地配合工作队深入揭发问题。在积极分子中，有的人在一夜之间也变得激进起来，紧跟工作队无限上纲。但这时我却跟不上了，我不习惯人云亦云稀里糊涂地跟着跑，也从未想过自己去夺系党总支的权！

1965年2月，传达了毛泽东的“二十三条”。社教工作队的高干们一反常态，立即改变了无限上纲、全面夺权的口气，将已揭发的问题一风吹了。他们不仅不再提夺权的口号，而且甩开积极分子，在四院楼上的会议室里跟原来的党政干部联欢，准备告别了。他们已奉命立即撤离北大。后来才知道，这是高举刘少奇“后十条”的中宣部工作队和高举毛泽东“二十三条”的北京市委在党的最高层短兵相接了。当时，北大是北京市委彭真的地盘，不买中宣部的账，刘少奇顶不住毛泽东，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的矛头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突然的转变中，我作为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从心底感到失落，莫名其妙，一种被利用、被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当初上“纲”时，我跟不上；现在下“纲”时，我又下不来。面对系里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不顾事实地大转弯，我愣了，真想哭！坦白地说，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得失，因为我本来就沒想去夺权。我这个人太自由主义，是当不了官、掌不了权的。我只为这么多高智者的盲从行为而难过！

在那几天，我对大学里的高智者、对当权的党内高干们，都彻底绝望了。在那天的日记中，我写道：“我曾全心地信任别人，信任党，崇拜别人，但是，现在看来我只能相信自己了，今后不能再去崇拜别人，要努力塑造自己。”后来这些想法被“文革”中的笔杆子翻出来，当作“个人野心家杨勋的反党言论”来批判。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1月的那几天，我心中的自我的确大大地强化了。那年我32岁半，党龄也十七年了。我集中全部智力思考：我遇到的这些本质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这样不假思索的紧跟权势？后来，我才清楚，“二十三条”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取代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领导北大“四清”了。

这时，我开始明白我心中神圣的党原来并不是坚如磐石般的统一，而且权力集中在中央上层，中下层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只不过是斗争的工具，他们如若不愿做这金字塔式权力机器的螺丝钉，就只有受苦受难了。

1965年“五一”节前夕，浩浩荡荡开进北大的社教工作队悄悄地撤走了。彭真决定利用暑假，把北大的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在位于北京市委附近正义路的国际饭店进行整风，把“四清”试点搞乱的队伍严加整顿，重新统一起来。参加这次整风会议的有学校和各系的干部及“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济系除了系里原来的党政干部，就是几个积极分子骨干，其中主要成员是李志远、王茂湘和我。有的人不是国际饭店会议的固定成员，不住在会上，只是临时到会。这时，全校的社教积极分子代表人物就是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聂是河南人，1938年参加革命，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妹妹。1961年，她通过聂真找了陆平，从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调来北大，先任经济系副主任，后因同系总支书龚理嘉矛盾，调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在哲学系她还是不满足，借崇敬鲁迅发牢骚，说鲁迅在北大只不过是一个讲师而不是教授，公然把自己同鲁迅先生相提并论，引起人们反感。“四清”开始后，她想借机向党委夺权。

在国际饭店会上，原来的干部以党委书记陆平为代表，得到市委大学部的宋硕、彭珮云等人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由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主持召开，列席的还有邓拓同志。彭真在动员大会上说：“要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要一个系一个系地整，直到思想组织都统一在党的原则上。”彭真宣布，不管是什么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统一了的就回校，统一不了的留在国际饭店继续整，直到统一为止。会上的一切费用由市委承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当时的气势，绝不亚于张磐石工作队进校。彭真一向自称是“北京市的土地爷”，记得1956年我刚到北大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大学生毕业分配动员会上听过他的报告，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次会上，彭真要求大学生们服从国家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说：工人农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就要为工农服务，回到工农中去；假如谁不

服从分配，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关在黑屋子里过一星期，不给吃的，看他服从不服从。针对个别拒绝去边远地区扬言要自杀的学生，他高声说：“我成全你，给你条绳子，你可以去天安门上吊！”

就在那次会上，彭真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宣布他是“北京市的土地爷”，说：“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北京打烂了，只要我当市长，一定会重新建设一个新北京！”

对于彭真整治北大的意图，当时我不可能理解，但是从会上的气氛看，我感觉到，这是一场不寻常的恶战。不论是大会小会，斗争双方都很硬，每天都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但我不明白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国际饭店会上，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一般成员，本来可以是旁观席上的观众的，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我的中立地位很快就稳不住了。虽然我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干部政策问题并不感兴趣（如李志远一再重复的“该提拔的没提拔，不该提拔的提拔了”之类），对已揭发的问题上“纲”下“纲”，我也跟不上。概括地说，当时我对双方都不信服。但是，从个人经历和我的思想感情上，我还是倾向于以李志远为首的解放区来的一派，对龚理嘉等人因形势有利而飞扬跋扈的样子很看不惯，对李志远、王茂湘等人受压制排挤，有些同情。于是，我就基本上成了积极分子这一派了，而且我的情绪变得很激昂，唱着抗战时期的歌曲，要为“真理而斗争”。就这样，经济系的几十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死去活来地斗了半年，直到9月开学后才回校。这时别的系，特别是一些理科系，早就回校了，有的只呆了半个月，问题就解决了。国庆节前后，只有哲学系仍然留在饭店继续斗，轮流主持会的是陆平和彭珮云，被整的一方主角是聂元梓。在一次会上，我看到坐在台前的彭珮云和聂元梓，表情都很强硬。

从国际饭店回校不久，我就被派到朝阳区高碑店人民公社参加农村的“四清”了。哲学系的人直到11月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上海的姚文元、张春桥们打到北京城下，他们才从国际饭店撤出来。这时，彭真已经顾不上北大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北京土地爷”面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铁扫帚，也不得不后退了。哲学系在国际饭店的斗争，前后持续了

八个多月时间，埋下了北大文革的种子。聂元梓从此走进了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的左派行列，走向了全中国，走进了中国现代史，也同我们这些不买她账的“左派战友”结下了不解之怨。

高碑店“四清”工作队是由北大师生和朝阳区各机关工厂调集的干部混合编队组成的，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是国棉三厂的工会主席万云同志。万云是从抗日根据地来的干部，年龄比我大几岁，人很朴实随和，说话直快，我们在一起处得很好，什么都说。万云从1964年就调出来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同北大历史系教师郝斌、学生李讷等一起在顺义农村“四清”。她同我讲了李讷任性，江青无原则保护她的宝贝女儿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云是个办事认真、待人诚恳、作风平易近人又敢于负责任的人，李讷被西方记者称为共产党中国的红色公主，她任性起来，谁敢管？万云则不管你是谁，该管的就管，不怕得罪人！万云是山东人，是万里的妹妹，我对那里的老乡太熟悉了，就是那种作风。

在小花园队“四清”，前后约有半年时间。正当我们在农村全心参加“四清”时，聂元梓却为了逃避下乡，也为了寻求政治保护，跟一位叫吴溉之的高级老干部结婚了。据说，吴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¹老资格党员干部，部长级别。跟这种人一结婚，似乎“社教”中的问题就可以不再追究了。

这消息传到高碑店公社，在乡下的北大社教积极分子们无不目瞪口呆。原来还把她当作正确方向的代表，想不到她竟然这样背叛大家，拿原则和婚姻做交易，溜之大吉，真是太卑鄙了。

此后，聂元梓的各种丑事被传了个底朝天，连她在哈尔滨同被划为右派的丈夫打离婚，以及在北大八公寓作风不正派，被保姆发现等等都传了出来。至于她揭发北大存在的问题，想夺党委书记大权，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总之，此人不仅政治上投机取巧，一心往上爬，而且道德作风败坏，是一个少有的坏女人。得知这些情况，真叫人哭笑不得，不少积极分子好像挨了一闷棍，我也庆幸自己没有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¹ 吴溉之没有当过北京市副市长——本刊注。

当年她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时，曾有不少的追随者。北大社教开始后，也有人同她私人关系很密切。聂是“三八式”老干部，又做过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¹，有一副高官派头，很能唬一般人。记得1962年她刚来北大经济系时，穿着白色凉皮鞋、绿色绣花真丝衬衫，真像一个很阔气的有资格的大干部啊！当时经济系有的人曾经忙着帮她搬家、迁户口，办杂事，从人民大学调来的邹鲁风副校长的秘书盛皿还跑前跑后处处照顾她。有人可能真以为她是一颗即将跃上北大天空的新星了。曾几何时，剥去伪装后竟是这样一个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池浅王八多”，在北大这个大校园里居然什么鸟都有啊！

在经济系，除了少数不了解底细和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多数正派人都鄙视聂元梓这个人，认为她既不像教师，也不像知识分子干部。她当经济系副主任从不讲课，处处摆谱，叫人伺候。住在朗润园八公寓时，她家的保姆喊她少奶奶，她居然答应。这种人哪里像一个党员干部！

在经济系里社教积极分子中，有的人是追随聂元梓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贫农出身的王茂湘，他们常同哲学系聂等一伙人串连。但是经济系的大多数人不买聂的账，其中为首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志远。李志远是抗战干部，1956年从中央党校调来北大。李原来是中学语文教师，上人民大学后精心研究《资本论》，来北大后讲授《资本论》并编出了《资本论》第一卷讲义。他讲课效果极好，深得广大师生好评。李还是经济系党总支委员，很受群众拥护，在党内外相当有威信。李志远对聂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使聂感到很不自在。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我是倾向李志远的，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很信服他的观点和为人。只是他从个人立场出发，多次批评党总支²的干部政策（“该提拔的不提拔”），给我留下不太好的印象，所以对他的追随也是有保留的。■

摘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¹ 聂元梓在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没当过市宣传部长——本刊注。

² 综合上下文，疑为“系党总支”——本刊注。

【读者来信】**1. 皮皮侠建议《记忆》实行会员制**

本来我们全家说好了端午节一起到十渡去，没想到，老爸不去了。问他忙啥？答曰：给《记忆》校稿子。为什么找你当校对呀？老爸说，《记忆》缺人，而他又特想发挥余热。据老爸说，贵刊有好多事儿要干：采访老五届、整理书刊、录入资料、编辑稿子，还有每期的三校等等，总之是既缺人手，又没钱雇人，只好在读者里找义工。我奇怪，贵刊为什么不实行会员制呢？——就像那些俱乐部似的，想来？好呀！请填写登记申请。贵刊同意就成为正式会员，有资格免费获得《记忆》。当然，你也不能光占便宜，也得尽点义务。比如给贵刊当校对，像俺老爸似的。年轻的，可以替你们跑腿，想采访谁，让他们开车去。眼神还好的，可以为贵刊录入资料——据说，这是防止老年痴呆的有效办法。

怎么样？不错的主意吧？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今年免费。■

2. 七月流火提议出“北京高校文革专辑”

我从小就是在地质学院的大院里长大的。地院文革其实就是两年，当年的造反派头头，除了聂树人愿意说说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说话。我爸说，说话的不见得有理，不说的可能有事。与其用八旬老人的回忆录充数，不如把地院专辑并到“北京高校文革专辑”里。■

3. 魏平谈宋翔雁的回忆录

看了宋翔雁先生的文革回忆，心里沉甸甸的——我父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过来的。开始我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忠君爱党，长大才明白，这是洗脑的结果。宋先生是令人尊敬的老知识分子。文如其人，他的文章诚恳、缜密、严谨，还有点老年人的絮絮叨叨。■

❖ 本刊说明：本期封面取自互联网。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记忆》的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慕青主

本期校对：邝 风、立 嘉